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4年10月31日第15期
总第12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第120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

2014年10月31日

目 录

【专 稿】

戴为伟整理 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

【评论】

章 铎 季羨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
——再读《牛棚杂忆》兼与舒声先生商榷

郑 实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
——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

【述 往】

郝 斌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
楔子
“阴阳头”旋风

李 檀 一个普通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5-6）

【资 料】

俞小平 文革书简——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
(1966年8月26日——12月21日)

北京大学1967年大事记

【读者来信】

- 1.吴大印谈北大文革专辑
- 2.杨新敏谈戴煌十万言书

【版权声明】

【专稿】

郑仲兵口述
——北大文革片段
戴为伟 整理

时间：2014年5月18日、7月16日

地点：郑仲兵家

主访人：戴为伟

受访人：郑仲兵

方式：录音与笔记

戴：对于1966年为什么出现聂元梓的北大七人大字报和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的全面展开，两派认识分歧比较大，想听听您的意见。

郑：追寻1966年文革历史的发生和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的出现的缘由，站在一个全面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它（文革），可能会看得清楚一些。我认为现在搞文革史，就事论事的比较多，还以为这就是注重史实。比如说，写文革的书，没有几本书能够提到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状况，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衰成败的历史状况，没有人提到毛泽东对这个历史状况的思想反映（提到反修防修高度）。包括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的文化史。我曾提出，两位作者都是名符其实的外国人，他们有条件站在世界历史的全球高度去观察和叙述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仍然囿于中国事件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这部书的遗憾。不用说官修的文革史，即便

是民间的，甚至是海外学者编撰的文革史，轻则在大框架、结构、分期、语境上，重则在概念、结论上都难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窠臼。

另外，研究文革的发生，往往还忽略了中共建政十七年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情况，我觉得要站在中国当时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发展的高度上，去认识文革的出现。这里牵扯到学生为什么会那么积极地参加文革，是不是光是一个上当受骗的问题？全国人几乎都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无一例外，都是响应文革的号召。就是保守派也不会说，我是反对文革的。他也说，我们是最早起来搞文革的。派工作组，也是这么一种认识。为什么？

文革出现在反右后的十年，是在中国已经搞了三面红旗，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当时共产党的极权是越来越严重。甚至（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说一句话，底下的人都不敢反对。学生也好，下面的基层干部也好，都是非常压抑的。农村也是刚刚搞过四清，基层干部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个人财产被剥夺殆尽，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吃不饱，基本生活资料供应严重短缺，也在贫困线上挣扎。（文革）是在这么样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

北大的文革运动，也是在北大“四清”运动之后出现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四清”运动遗留下的严重矛盾而产生的。不要以为“四清”运动是解决矛盾的，它是制造矛盾的，每一次毛泽东发动的运动，可以说都是制造、增加和激化矛盾的。

那么，为什么第一张大字报会被毛泽东选中？在这之前是不是有更早的第一张大字报？肯定有的。据我知道，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就比聂元梓的大字报早。高教部卢正义、徐非光的大字报也比聂元梓的早。他们曾经和聂元梓争过第一张大字报究竟是谁的（笑）。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做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为什么一煽就起？对这种历史现象怎么看？是不是都是上当受骗了？为什么这张大字报会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为什么这张大字报会起到使文化革命进到真正一个阶段的作用？聂元梓是第一张大字报起草人吗？聂元梓在第一张大字报中做了些什么事？这个都要弄清楚。第一张大字报的成员后来为什么分成两派？北京大学为什么分成两派？井冈山这派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起来的？当时出现了声讨校文革的大字报，跟后来否定文化革命是不是一样？是觉得聂元梓右了还是左了？也可以考察聂

元梓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摇摆性。很明显的聂元梓一会儿站在造反派立场上，一会儿站在当权派立场上。聂元梓的观点更像谁？更像毛泽东的观点，更像江青的观点，还是更像周恩来的，还是更像林彪的观点？还是独立的观点？前后有什么变化？北京的天地派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全国搞文革的地方都分成两派？聂元梓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个人的野心表现？

其实在文革中，仅仅讲什么野心，一点意义都没有。当时年轻人，都想当著名造反派。（有野心，在那种情况下，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在各个关键时候，个人是什么态度和观点？在文革历史过程中是否有反思、有忏悔、有觉醒？

许多事情本身都是文革的产物，比如说聂元梓看不起谢富治、吴德，后二人也看不起聂元梓。这些事情当然可以研究，它对后来的一些事情起了作用。但是，你上去和他上去都是革委会的头儿（没什么区别）。还有文革中不管哪一派，派的头儿能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方面能起作用，在什么方面又不能起作用？这都有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的。一夜之间从造反派变成保皇派；从革命领导干部，就可以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就是例子，为什么？这个就说明，有些事情，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跟当时的什么思潮有什么关系？这个都要去研究。

反对中央文革的势力和北大有什么关系？反对王关戚和北大有什么关系？毛、江为什么亲自要把王关戚“端出来”？像聂元梓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王关戚？反对之后，江青为什么反而要镇压他们？文革中军队在学校的作用影响？具体到北大，解放军和北大文革有什么关系？

刚才讲“野心”问题，学生到各部委夺权过程中都有表现。在北京市成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当时各派势力是如何角逐的？新北大公社是什么角色？聂元梓是什么角色？为什么后来否定文革以后，抓起来的人多是聂元梓他们反对过的人？包括后来北京市的秘书长周景方等。谢富治在“两案”审判中，被确定为江青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聂元梓又是当年反谢（富治）的头面人物，并曾因此遭到整肃打压。这也应算是聂在文革中表现的一方面吧？。

但是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实际上无论是聂元梓也好，还是其它红卫兵头面人物也好，在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们就）退下历史舞台，不仅退下历史舞台，而且他们都挨整了，无论是地派还是天派。后来“四人帮”垮台了，为什么邓小平还要把这些（人）判刑？在全国还抓了很多人，叫做“三种人”。多数本来

都挨过“四人帮”势力整过的人，为什么后来要捞出来重新整？

这就牵扯到在否定文革过程中的两种思想。文革真正的祸害在哪里？邓小平他们怎么考虑的？老百姓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邓小平会归结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反对自由化？为什么老百姓要提出反对专制主义，要求搞政治体制改革，搞宪政民主？对于十年文革的认识的不同，又会影响到对改革开放的思路，出现了邓小平的“一条腿改革”，胡耀邦的全面改革和陈云的“鸟笼”政策等等。所以对文革的认识问题又牵扯到改革开放当中的许多问题，牵涉到抓五大红卫兵领袖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冤案？

戴：前面您就文革历史，提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很有意思。我想下面能否具体地谈谈您对北大文革和聂等七人大字报的看法？您在文革中和北大的接触，大约有8、9个月的时间，从1967年1月抢档案事件之后到9月您完全失去自由这一段时间。

首先我想问：据您的观察和了解，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怎么出来的？是康生夫妇策动和制造的吗？

郑：前面我已经说过，北大的文革必须从社教运动说起，不然你就不知道聂元梓为什么要写第一张大字报（它有好多矛盾是从社教开始出现的）。因为社教运动有一个反复，原来是中宣部按照陆定一甚至是毛的意志，去调查，去搞四清的。聂元梓他们七人大字报的人（当时）都是社教积极分子。后来邓小平、彭真把这个事情翻过来，聂元梓他们就变成了反党行为，社教积极分子便成了被整肃的对象。而且当时已经内定了，这些人都要到基层到农村去，不准备让他们再回到学校。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情况。阮铭是中宣部派去的工作组成员，因为发动积极分子起来揭发北大党委问题，这时也被认定犯了错误等待处理。当然，社教运动本来就是左的行为，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为。但是，邓小平、彭真他们把它翻过来后，就更左了。

正当聂等“积极分子”走投无路之际，突然听到“五一六通知”，“通知”事实上宣判了彭真和北京市委的“死刑”，令聂等“积极分子”又萌生了希望。他们议定写大字报阐明自己观点，进行反击。当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工作组正在北大调查，他们就找到曹轶欧，问能不能写大字报？曹说可以。宋一秀起草了大字报，又经杨克明改写。聂元梓根据“五一

六通知”的精神，加了一些标语口号（笑），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呀，什么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赫鲁晓夫反事命修正主义分子呀，诸如此类政治性很强的标语口号。聂元梓究竟加了哪些话，都可以弄清楚的。江青和康生都说是自己把这张大字报交给了毛泽东。毛一看，正中下怀。正好可以利用它来点全国文革之火。现在一定要说，这张大字报是哪些阴谋家搞出来的，是没有根据的。康生看到这张大字报，把它送给毛泽东，这也不为过。这张大字报可以说是“五一六通知”在北大的现实反映。

90年代，我见到聂元梓，曾对她开玩笑说：你们的大字报哪一点跟马列主义连得上，怎么就成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都笑）她听后也笑了。不就是利用她的大字报吗，利用完了，不也就倒霉了嘛。其实，聂元梓（经历）也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命运。

戴：您在文革中是怎么和聂元梓他们相识的？

郑：1967年1月15日，中央统战部等处机密档案被抢，我是反对抢档案的。当时发布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抢劫档案的说成是“革命行动”，把反对抢劫和保护档案的，说成是“保皇派势力对革命左派的迫害”（后来才知道是江青、谢富治的意思）。因蒙此冤屈，找到了聂元梓，希她能向最高当局反映真情。见面后聂只表示“是革命的将来总会走到一起的”。1967年秋，蒯大富还找过我，问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背景，那么早就知道王力、关锋的问题。我跟他讲，没什么背景，就是因为他们支持抢劫统战部档案的行动。觉得他们是抢劫档案的后台，而我们要抗争，要反映出这种认识，所以就尤为关注和研究他们。

先是北大东语系有个好像叫“铁扫帚”的战斗队，因为同情我们，进驻到民族学院，跟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笑）。当时学校文革群众组织，大的叫公社，下面是兵团，再下面叫战斗队。他们也把所了解（民院）的情况，经常向总部汇报。

后来有一次，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聂元梓副手孙蓬一正在当众发表演说，提出要反对极左思潮，提到抢档案的头头的名字叫吴传启、林聿时，还说他们的后台是关锋、王力。我觉得挺解气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和我差不多。

这样慢慢的，我们和聂、孙，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就多起来了。在这个过程

中，观点和我们相投的，还有中宣部的阮铭，人民日报的王若水等，他们分别是中宣部和人民日报一派的负责人。孙蓬一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

戴：这个人还在世吗？

郑：死了20年了。

戴：孙蓬一和聂元梓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吧？

郑：孙蓬一比聂看得透，聂元梓还有功利主义的东西。他基本是理想主义的。他不怕死，敢说敢为，少些城府；聂元梓有城府，强调策略。当然，他们的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孙蓬一这个人有识有胆，有侠义气概，是我特别崇敬的人，不仅我崇敬，而且王若水、阮铭，都非常喜欢他，敬重他。他进监狱后，曾反对狱中对他人的非人道，结果被弄到死牢里去，对他施以酷刑。李冬民非常了解这个情况，他曾经和孙蓬一关在一个监狱中。等放出来以后，孙蓬一已经疯了。在他清醒的时候，几次自杀未遂。最后是脑溢血死了。很可怜！

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世？

郑：他14岁加入共产党，这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1945年）。他父亲被日本法西斯枪杀了，他是烈士子弟，是抗日战争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北大哲学系学习，毕业后留系任总支副书记。“四清”运动中，亦为“积极分子”。文革中，他最早提出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问题，公开提出反对王关戚。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文革后期，工军宣队进校后，他一直挨整。那时候，我们偷偷地见过面。大概到了“四人帮”垮台不久，那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1977年），他还没被解放，他从劳改的地方跑出来，先到天安门广场，再到我家。我们一起去看看阮铭，他（到阮铭家）就跟阮铭说，我真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挺冷静的，就说：“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当时孙蓬一霍的一下子站起来，说：“即便是这样，为了党、国家、民族的大局，我也在所不惜！”

孙、阮对话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耳际，然而不幸被言中了。过不到半年，抓“五大（学生）领袖”的时候，把他也抓了。

我后来找过于光远，因为那时候，邓小平还经常接见他，于光远对我说：“邓小平一旦下了决心的事，很难改变”。他说找机会吧。我还找了陈一咨，因为当时陈一咨和邓朴方是朋友，又和邓力群来往很多。陈一咨原来也是北大的，文革

前被北大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他是井冈山一派的，与聂元梓、孙蓬一是对立面。他就跟我说：“我帮你这个忙，不是为了说明孙蓬一正确，我对他还是有看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后来，他跟我说，他找过万里、邓力群，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没有帮上忙。因为邓小平下了决心，确实就很难让他改变。

后来孙被弄到青海，服刑期满了，还在那个（劳改）农场里面，还被变相关押。之后，他的姐姐冒着生命的危险，到青海，把他偷偷地带出来。那时候已经是“六四”过了。他到了我家，我母亲，还有郑伯农、王若水、阮铭、肖灼基、胡志仁、李春光和另外一些熟悉的朋友都到我家。当时我看他不大正常，谈到激动的时候，把筷子都折断了。因为他是逃跑出来的，他姐姐就把他带到大连去了。他姐姐、姐夫都是老军人，住在一个干休所里。

但是他在那边知道一些六四“政治风波”的真实情况之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在干休所大骂。后来家人找个借口，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从那个地方出来，（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我现在是工资、党籍都没有，靠老婆养着。后来又一次说，一个部门（大概是民政部门）说他是烈士子弟，一个月补助他15块钱。拿到那15块钱后，他说，你看，我现在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要靠我父亲来生活。结果当天他就去撞（屋里）的暖气包（金属的一组暖气片），头破血流，没死；以后又想办法用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被救过来。他本是一个极其自重、自尊的人，唉，反正他的命运比聂元梓还要惨得多（沉默）。

戴：抓他（孙蓬一）是在邓小平上台之后——

郑：当然！就是在“两案”（林彪、四人帮）之前1978年——

戴：我记得我父亲好像还参加过批判他们（五大学生领袖）的公审大会。

郑：其实不应该抓他们。

戴：聂元梓和你们都属于天派吧？

郑：广义上说是这样。实际上，文革中北京除了天派、地派，还有一派偏保守的。这派除了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王若水的人民日报井冈山、阮铭的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民族学院的抗大公社外，还有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等。1967年夏季以后，聂元梓和阮铭、王若水、还有我有较

多接触。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反对极左思潮，都对王关戚，对谢富治不满。

戴：您是否认为在文革中你们比较正确？

郑：不是的！不论是聂元梓他们，还是我们，包括其它偏保守的组织，在文革中也都干过许多荒唐事。现在回首往事，应该明白，起码在北京是这样，文革中的各派别，都是认为“造反有理”，主观上都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搞文化革命的。虽然激进程度不同，具体认知有别，但说不清谁对谁错，因为大家的意志都堕入了毛的“反修防修”的窠臼，大家都是受蒙蔽的。真正的觉醒，或者说正确，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过程。文革后期，到大家都走投无路了，特别到“四五运动”（1976年初），这才谈得上有所觉醒。文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要去翻既往的派性，去纠缠当年的小是小非，小恩小怨。

戴：他们怎么就会分裂呢？

郑：从所谓的“一月夺权风暴”到反击“二月逆流”，这是一个分化、站队的过程。其实，天地派无非是大同小异，在我看来，王大宾、谭厚兰和蒯大富、韩爱晶在文革过程中的激进程度无太大差异。主要是各家互不服气吧。因为就校名而言，北京地质学院属“地”，北京航空学院属“天”，所以才有天地派之说。据我观察，当时中央文革是更倾向于地派，最欣赏地院“东方红”。江青似比较喜欢韩爱晶。蒯大富这个人，虽然在文革爆发期很左，行动很果敢，但是他并不是特别服从组织纪律的人，也不是可以令人轻易摆布的人（笑）。

戴：王广宇的回忆录里写过蒯大富当时的一些状态。

郑：话再说回来，其实，大学红卫兵运动（文革学运）领袖的命运很耐人寻味，即：被利用而狂热——迷茫和徬徨（毛说：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挨整肃而程度不同的觉醒。文革结束后是进监狱，还要让他们，连同广义的“红卫兵”去承担文革中的动乱、灾难、特别是老干部挨整的责任。

戴：您印象里，觉着在1967年1月到9月期间，北大重要的事情都有哪些？

郑：日久天长了，只记得1967年1月，有教育部夺权事件；之后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事件；之后有民族宫展览事件；之后有各院校到北大游行示威事件。

戴：那还有个“二·四批示”的事情？

郑：对，在1—2月间，有一个“湘江风雷”事件，即湖南“湘江风雷”这么一派群众组织，有人制造了007号密令，诬陷周恩来要利用湖南军区发动兵变。

2月4日，中央文革批示，以“反动组织”之名，取缔了这个组织，称“二·四批示”事件。聂元梓他们曾介入此事。到5—6月间，中央文革又给它平反了。

“二·四批示”这个事，后来被搅得很乱，北大工军宣队在审查聂元梓及校文革有关人员过程中，曾制造混乱，把反对周总理的罪名加给聂元梓他们。当时我清楚这个事，因为“湘江风雷”中确有人鼓动反对周恩来；北京也有人在煽所谓“旧政府与新文革之争”的风。当时新北大公社对这个事情，态度比较明朗，聂元梓和孙蓬一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份拙劣的诬陷周的材料，孙还把它作为揭露“湘江风雷”罪行材料，亲手交给邓颖超，邓表示感谢他们对周总理的爱护。文革中孙和我说过这件事。据我所知，聂、孙他们一直认为周恩来应是自己的后台（笑）。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观念和周恩来比较接近（又笑）。比如反击“二月逆流”，我们不同意打倒所谓“大闹怀仁堂”的老师老总们，内心是同情他们。

戴：这些我从北大大事记里都看不出来的。

郑：当然看不出来。我也翻过北大大事记，编得不好，不仅内容有缺失、有不真实的地方，而且还带有很强的派性。从史实和史识的角度看，价值都不高。

戴：看完北大的大事记和聂元梓的回忆录，给我的感觉是，当时聂元梓是很积极的，她所谓的反对中央文革，是她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站在所谓政治正确的角度上，来表达当时（文革时期）的一种状况。大事记给我的感觉是，聂元梓当时很积极地配合中央文革，把北大搞得非常乱。您说的这个过程，人的思想的变化等等，从大事记里，没有感觉。

郑：文化革命，（北大）有没有聂元梓，北大都会乱，每个单位都会乱起来的。聂元梓因一张大字报，声名远扬，影响力很大。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有了聂元梓才乱。其实聂元梓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权力。北大一开始是进工作组，是工作组当家的。工作组走了后，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聂当了主任，活跃过一段。毛、江当时对她也十分信任，她积极配合中央文革的工作，到上海去支持上海文革，包括常溪萍事件等等。今天看来，当然算是“助纣为虐”的行径。当然，当时毛泽东和江青让她去，她也不可能不去。

戴：杨克明和聂元梓分裂的过程，您清楚吗？

郑：不大清楚，这是比较早期的事情。但是我印象中，因为聂元梓这个人比较自尊，是个女强人，杨克明实际上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比宋一秀作用

还大，宋一秀的第一稿不理想，杨克明把它改成一篇基本成型的，聂元梓后来又加了一些口号（而已）。杨克明当时也是中央文革比较重视的（人）。后来，聂元梓成为校文革主任，杨克明就当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可能杨也有些不服。我记得大串联回来后，聂也没什么动作，跟不上形势，就被炮轰，说你要不行，就应该自己下来。她对和她有异议的人，也采取了压制的做法。分裂自所难免。共产党里，本来就是宗派林立的，又没有通融、调节、协和的机制。这是钢性体制的问题。杨克明也未必看得起聂。说理论（她）没有多少，说资格（她）也不是最老的，说业务、笔杆子都不如杨克明等人，就是一个比较有能力、有主见的女干部。（笑）聂元梓这个人还是能说会道，表述清楚，记忆力也是挺好的。但是，聂本是“当权派”，又要扮演“造反派”角色，而文革初始阶段，情况瞬息万变，聂驾驭不住。1967年1月以后，中央文革对聂的态度有改变，王关戚，特别是关锋，对聂颇看不上眼；3月初，陈伯达在北大就说聂元梓是“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第二天，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告成立。杨克明、周培元、孔繁、郭罗基等原来社教积极分子，都成了井冈山的负责人。

1979年我调到中宣部工作，孔繁是我的同事，他给我的印象是厚道持重有见解，一个严肃的学者，后来调任社科院宗教所副所长。郭罗基在周培元任北大校长时出任校办主任，参加过理论务虚会，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思想深刻，文笔犀利，在80年代我们成了朋友。他们俩都是文化思想界知名人物，不会再沉缅于派性，听听他们对聂元梓和北大文革的评说，对你们一定会有帮助的。

戴：您能谈谈，九大之前，聂元梓与您沟通的细节吗？

郑：细节回忆不起来了。好像当时她跟我讲过，江青对她态度有很大的变化。

戴：这是1968年？可是您不是被抓——

郑：还是在1967年，我被抓起来之前。应该在夏天到秋天的时候，那时是不是开始筹备“九大”了？她（聂）对我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对她很冷淡。但她又说，有一次碰见周恩来对她还不错（使劲想，但想不起来的样子）。我们当然都希望她去参加“九大”或者当个中央委员之类的。实在记不清楚了，可能得看一点材料才能回忆起来。

戴：我感觉她和您已经是很推心置腹了，可以和您说这样的话——

郑：她当时能够说心里话的人不多，跟我是——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说

什么，她是会听（进心里去）的。她会认为我是理解她的。

戴：聂元梓和王若水、阮铭他们后来的联系您清楚吗？

郑：不清楚，因为我1967年秋天后就被隔离审查，之后又进了监狱。阮铭自陶铸倒台以后，就挨整了。1967年8月，聂元梓曾邀阮铭、王若水和我到北大院内讨论过形势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和王若水见面。后来阮铭去了干校，长期被隔离审查。王若水在林彪事件后，提出批极左，并上书毛泽东。毛认为林彪“右得不能再右了”，点名批了王若水，他也长期遭整肃。（戴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理《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恩来下令撰写批评极左思潮和林彪的文章，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王若水在1972年10月14日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占用整版篇幅发布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受到张春桥、姚文元批评。王若水在不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意见是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下，写信给毛泽东告状。结果王若水受到批判，撤职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

1977年王若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其间，他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深入人心。同年，阮铭应胡耀邦之邀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负责编辑《理论动态》，是为耀邦的文字助手。理论务虚会前后，王若水、阮铭还有李洪林，被誉为理论界三杰。王若水1983年遭胡乔木、邓力群陷害去职；2002年病故。他与聂元梓一直有联系，聂出的回忆录是他写的序言。阮铭在王震主政党校期间，遭迫害，耀邦去职后，他到了美国。据我所知，这个期间他与聂元梓没有过接触。

戴：后来您什么时候与聂元梓又有联系了？

郑：聂元梓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

戴：她坐满了给她的刑期了吗？

郑：好像没坐满，叫做保外就医。她放出来后，也想起我们，她也想办法找我。因为我跟她姐姐聂元素、姐夫梁寒冰也是望年交。后来就见到了。当时她们河南老家还通过她来做生意，做的不错。当时她还在北京大的宾馆里租了商务房。

戴：那时她有多大年纪？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郑：应该有六十五岁左右，可能是1989年前后。

戴：您看过她的回忆录？

郑：看过。她写回忆录时希望我参加，但我因故没有答应。她这本回忆录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都帮了忙，她自己也改过几稿，最后由王若水的儿子王思彤帮助在香港出版。因为江青和邓小平审查、批判、关押她时有许多强加给她的罪名，所以她在自述中不能不带浓重的辩诬色彩。

后来，我多次对聂元梓说过，你写了这么一个辩诬的东西，你先放在那里，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一个“聂元梓忏悔录”。用完全批判的眼光，把自己参加革命的这一生，几十年，好好地反思一下，写一个忏悔录，特别是文革的忏悔录。她说，好好好。我是希望她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对文革的问题上，她能够大彻大悟，但是这很难，因为她毕竟是93岁的老人了嘛。

戴：怎么才算“大彻大悟”呢？

郑：我觉得大彻大悟，对于参加文革的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长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反思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和运动的全过程。特别是共产党建政以后，到文化革命，一直到文化革命快结束，这个全过程。有很多人文革后，已经开始觉悟，这比较集中反映在“四五运动”（1976年）。“四五运动”最精彩的，说明人们觉悟了的话是：“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就把中国这个专制主义的本质问题说出来了。这就不仅是毛泽东，而是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毛泽东都是专制时代。当然我还觉得，时至今日，还是有人多少不清楚，还有不少人并没有进一步觉悟，甚至认为中国人就需要专制，还在鼓吹“新权威主义”，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专制主义的“明君”身上。当然，这个责任应由我们体制来负。不改变体制，永远都会有人不觉醒。甚至不觉醒的人还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政治力量。

戴：您能不能谈谈杨勋事件？

郑：杨勋当时是井冈山总部成员，因为中央文革支持聂元梓压制井冈山，她自然对中央文革有不满情绪和言论，加上杨勋的弟弟曾上书毛泽东，认为江青不适宜做中央文革的领导，聂元梓他们就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虽说什么权威人士打过招呼。我1995年，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杨勋。他的儿子好像写过胡耀邦或者赵紫阳传记体的东西，杨勋当时没有和我们说到她的冤情。但是我的同行者吴象先生和我说，当年杨勋被聂元梓害的蛮苦的。此事虽属荒唐时代的荒唐事，但今天看它，算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杨的迫害，聂

元梓当然负有责任。如果文革结束后仍无悔悟，那就更荒唐了。

戴：但事隔四十多年了，彼此都经受了没顶之灾，是否彼此都要宽容一点呢？

郑：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鲁迅先生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都想开了，一个是历史环境的原因，一个是共产党体制的原因，还加上毛泽东这么个人，亲自发动领导的嘛（笑），你说有什么办法？包括对蒯大富，甚至戚本禹等——戚本禹本来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才子，不容易，但是，在那种环境中，他也是受到传统的党文化教育，这种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想借古说今，什么忠王李秀成不忠了，起先还把它当成一种学术认识，后来被毛泽东发现以后，和现实联系起来，他还觉得倍受青睐，挺光荣的，搞出甜头来了。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被利用了，还充当了急先锋，但文革十年，毕竟也就活跃了一年多，以后在狱中度过了18年。聂元梓1978年工军宣队进校不久，就被隔离审查，十年文革，也就活跃了不到两年。1978年又被判徒刑十七年，差一点丢了老命。

戴：但是有人对她还是不依不饶的，您怎么评价聂元梓？

郑：有人总是认为她是个坏女人嘛——会认为，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野心勃勃的，也是一个小江青。但是说实在话，就是我说的，说聂元梓有野心，咳，谁当那个（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不就那么回事嘛。何况她也未必这么想，即便她这么想，又怎么样？你谢富治想当，吴德想当，戚本禹就不能想？聂元梓就不能想？别人就不能想吗？别人想当就是野心？没什么意义。聂元梓因为反谢富治，反王关戚，反康生，反张春桥，对江青有二心，受了那么多苦，结果后来这些人都倒了，也没给聂元梓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说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祸乱文革的人。这就没有起码的是非了。我也不是说聂元梓就正确，没什么错误。文化革命的大前提就错了，她作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岂能不错？不用说毛肯定的第一张大字报造成的影响，就说文革初期，她竟带着红卫兵去抄丈夫吴溉之的家，这种为“革命”而“大义灭亲”的思想和行为，不是有悖于正常的人道、人情吗？但她在文革中已经挨过毛、江、谢和军宣队整了。而且，他在文革中也是处于逐步醒悟的过程。文革运动中罪恶祸乱，文革的历史责任，她怎么能承担得起！

戴：我也不赞许一些人一些非常概念化的议论、评价。还是纠结在个人恩怨、派别之间的冲突中，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上，谁更让人咬牙切齿这个层面上，思想

还活跃在这个层面上。您能站在这样纵观整个政治运动的变化过程，看到人在其中——实际上是在历史的一个大倒退过程中，无论是否有思想，都被卷裹在这样浪潮中跟着一起倒退。我很赞赏您的见识。

【评论】

季羨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 ——再读《牛棚杂忆》兼与舒声先生商榷

章 铎

2014年6月15日出版的《记忆》第114期刊登了舒声先生的文章《文革中的周培源与季羨林——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井冈山兵团”？》，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参加这个群众组织？他们在井冈山兵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培源和季羨林二位先生有几个共同点：都是北大知名教授，在社教运动中都是左派，文革开始时没有受到冲击，陈伯达6·5讲话以后，他们“认清形势”上了井冈山。周培源坐了井冈山的头把交椅，季羨林在东语系成为负责人。

周培源先生本是校文革结合的干部。他1967年3月27日在校文革举办的干部亮相大会上的讲话——我的检查，还声称坚决拥护校文革：

校文革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校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孔繁、杨克明。井冈山、红联军等反校文革的斗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他们向校文革开火，归根结底为的是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们进而还反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以广大革命派与井冈山、红联军等反动组织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这些人赤裸裸的向校文革夺权是不行的。

周先生在1967年6月5日以后，公开同聂元梓和校文革决裂，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他们的纲领。季先生在1967年6月5日前本在逍遥，后来“自己跳出来”上了山。

这两位老教授，参加井冈山的行动的背景是一样的，就是陈伯达的6·5讲话。舒声对此背景的介绍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的。本文依据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对他们上山的背景略作分析。

舒声在文中写到：“季羨林参加井冈山兵团后，当上了第九纵队（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中也是少见的。由于他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的组织，不久就受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击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动，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记忆》第114期第29页）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舒声完全无视季先生津津乐道的“自己跳出来”的事实，只讲了新北大公社如何批斗季先生，却回避了井冈山兵团同样也批斗了季先生。

季先生参加哪一派，本不是北大文革中的大事。他记错一些事，更是小事。何况他已仙逝多年，我们再提这些小事有不尊之嫌。但我等也已入古稀之年，留下一些解释和分析以正视听，也省得今后的读者看不明白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和舒声先生的文章。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声明：“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在“缘起”一节中还强调：“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他还写道：“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季先生说的这一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是真的吗？

手头正好有一册《牛棚杂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还有一册《季羨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请读者且

与笔者一起慢慢读来。

文革初期季羨林先生的快活生活

《牛棚杂忆》专有一节“快活半年”，叙述了季先生在文革初期的快活生活：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大约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心里异常喜悦……（《牛棚杂忆》第35页）

季先生的这一段话是符合事实的。北大的文革风暴是从毛泽东批示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开始的，北大党委被称为“黑帮”，北大社教中的某次会议被称为“反革命事件”，这些吓人的大帽子并非北大师生所创，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中提出来的。所以，风暴一开始，矛头所向，首先是陆平“黑帮”。首先拿出来说的，就是北大社教。东语系首当其冲的，是总支书记贺剑城。系主任季羨林先生是被视为“左派”的，并未受到冲击。季先生这样介绍他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表现：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我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牛棚杂忆》第38页）

从季先生自己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在社教中起先是反对陆平的，是站在“左

派”一边的，但后来又作了检讨。所谓“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就是社教的文件精神和社教工作队的动员工作。文革狂飙来临时，东语系的师生并没有认为季先生是“黑帮分子”，也没有人指责他是什么“社教叛徒”，大家都还是把他当作“左派”看待的，而且，他是党员教授，教的又是非常偏僻的梵文、巴利文，五年的学制，教的、学的还都限于基础知识，和封、资、修扯不上。他发表的论文，多属语言学范围，一般人也看不懂，所以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文革”之初被贴大字报的，除“黑帮分子”外，还有一些是和1957年反右运动有关的，有的是右派，有的被指为“漏网右派”，有的则被指为“包庇右派”。对于反右运动，季先生自己说，“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季羨林自传》第159页）季先生1956年就入了党，1957年转正，这足以证明他在反右时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文革”运动初期，东语系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批判季先生的大字报。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季先生写道：“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牛棚杂忆》第23页）。为季先生记载下来的，只有一张批判他的一篇散文《春满燕园》的大字报，这大概是1966年6月初贴出来的，为4日从南口村（季参加四清的地方）回到北大的季先生看到（《牛棚杂忆》第23页）。舒声的文章说，季先生“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在东语系，这张大字报只是许多大字报中的一张，文革中被贴大字报的人太多了，不能说被贴了大字报就叫受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更像运动过后组织给的结论。据《牛棚杂忆》记载，当时东语系的批斗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系总支书记，另一个是一位老教授，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显然，季先生并未遭到批判，只不过停课闹革命，季先生的系主任一职，便没有事情干了。他写道：“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牛棚杂忆》第37页）

尽管如此，以季先生的阅历和见识，他在“文革”风暴骤起之后，内心依然感到了恐惧。在这种心态下，他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了“待死斋札记”这样一个标题，并且写下了反映自己心境的一些文字，比如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详见后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暴并没有落到季先生头上。至于“快活

半年”的说法，有点保守，快活的时间还要长一些，还应该包括季先生在井冈山兵团九纵当勤务员并率领手下贴大字报、演说的时间，至少可以延续到1967年的9月。算起来，这该有一年多时间。换句话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季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还参加了东语系的一些活动。

按照《牛棚杂忆》的记述，季先生参加了接待外地来京串联学生的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军宣队（注：指1967年1月来北大搞军训的解放军）领导的，劝说外地来京人员返回原地区、原单位的工作。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当是1966年冬和1967年初。这些工作颇为艰苦，但季先生的心情很好，他写道：“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牛棚杂忆》第42页）

在军训队率领下，季先生还和东语系师生一起参加了一次麦收，背麦子。季先生写道：“我背的捆数绝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牛棚杂忆》第44页）这一次参加麦收，应该在1967年夏初。季先生的记述表明，直到这一年的麦收时节，他和东语系的系文革及新北大公社红九团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矛盾，而且，他还受到了表扬。

季羨林先生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时间和背景

季先生后来受到冲击，是因为他“自己跳了出来”，参加了一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并当上井冈山兵团东语系分支“九纵”的“勤务员”。那时的“勤务员”，就是头头。所以，季先生是作为一派的派头头而受到对立派打击的。

季先生为什么要参加对立派井冈山兵团呢？出自《牛棚杂忆》“自序”，并为舒声先生引用的说法是：

……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于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注：季先生的原

话是“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季先生说的是真的吗?回顾北大“文革”的历史,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

经历过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季先生上述文字说的是北大发生武斗之后的事情,时间在1968年3月底之后。至于“外来的中学生”,应即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温被刺死亡的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这是文革悲剧之一)。

季先生真的是因为看到了发生于1968年4月之后的“老佛爷”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才“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的那一派‘革命组织’”的吗?

非也。

上引舒声的文字写得很清楚,“……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动,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记忆》第114期第29页)

按照舒声的记述,在1968年4月之后的这一个时间段里,季先生还能够“拍案而起”吗?何况,在新北大公社批判季先生之后,季先生立马就被他心目中的“革命组织”井冈山及其九纵抛弃了,还能够参加什么“革命组织”呢?

顺便说一句,新北大公社虽然抄了季先生的家,却并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所以,他还可以一大早骑自行车去井冈山总部报告,并且让井冈山的摄影师到家里拍摄现场。季先生是这样写的:“天一明,我就骑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么可怕呀!——他们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牛棚杂忆》,第62~63页)这足以证明,在季先生被“打倒”时,北大两派之间尚未发生武斗,校园内的交通也未受到影响,更没有所谓“断水断电”的事情。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中专立一节“自己跳出来”，介绍自己“跳出来”的经过。统观这一节文字，混乱颇多，除了将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事情混淆在一起外，同样回避了陈伯达6·5讲话引发北大大乱的这一历史事实，同样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1968年发生的事移栽到1967年。这一节文字太长，不能一一具引，这里只引其中的一段：

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不全懂。……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她……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牛棚杂忆》第51~52页）

这是季先生30年后回忆的他1967年夏季“跳出来”之前的思想状况，这个回忆准确吗？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在这一段话里，有一些是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聂元梓并不是新北大公社的头领，而是校文革的主任；新北大公社是一个群众组织，并不是执掌北大大权的机构，掌权的是校文革；北大当时没有“革命委员会”，只有“文化革命委

员会”，它并不是按照1967年发出的“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成立的，而是1966年夏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经选举产生的；聂元梓是被选为校文革主任的，并不是她自己“摇身一变”可以变得成的；至于“杀了几个无辜的人”，是发生在1968年的事情。

在这一段话里，比较接近季先生当时思想的，是指责聂元梓“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这一句。这里的“上面”指什么？是指中央文革吗？季先生没有解释。至于“革命路线”，季先生说，“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不全懂”，“不全懂”，但是懂得一些，所以又说，“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牛棚杂忆》第51页）

聂元梓对待北大群众的态度确实有问题，但在那个时候，聂元梓遭到陈伯达、江青批评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她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具体地说，是对待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王力的态度问题，而且，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态度”层面，因为聂元梓在1967年4月10日那一天，当面向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提出了关锋、王力“结党营私”的问题。聂元梓不仅口头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组织并开展了揭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吴传启一伙的行动。而众所周知，吴传启同关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公开对吴传启一伙宣战。4月，关锋的大本营学部“红卫兵联队”分裂，傅崇兰拉出一支队伍“大批判”，反对吴传启（详见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见共识网）。1967年6月1日，北大公布了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调查材料，其中包含揭露吴传启是国民党党员，附上他的党证号码。

1967年6月2日，北京市20多个单位在学部开大会批判潘梓年。1968年1月12日，北京地质学院出版的“东方红报”的文章“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这样报道这件事：

六月二日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行了揪潘梓年大会。

北大等组织的行动打中了关锋、王力的要害，中央文革迫不急待地要把北大

发起的向吴传启等人的进攻打压下去。于是，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时针对聂元梓、孙蓬一4月10日的讲法，不点名批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

此后孙蓬一被称为“孙赌棍”，聂元梓也被扣上“搞政治赌博”的帽子。这天的讲话是不点名批评，又没有北大的人在场，达不到陈伯达想要的效果。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再次出面讲话，严厉批判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等等。

陈伯达的6·5讲话，在北大和社会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也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陈伯达的鼓噪下，校内外众多势力，借机向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发动攻击，罪名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二月逆流派”、“分裂中央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反对派声势颇为浩大，一时间真是黑云翻滚，似乎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马上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一片乱象之中，季先生“冷眼旁观”，觉得机会来了，便不再逍遥。他具体在什么时间参加对立派，当时发表过什么样的声明，宣告过什么样的主张，现无从查考。据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1967年6月16日，季羨林先生已经参加了大饭厅前对立派举行的要求聂元梓下台的静坐示威（陈焕仁：《红卫兵日记》，第35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这大概可以算是季先生参加对立派的起步吧。由此也可看出，季先生参加井冈山兵团，是陈伯达6·5讲话以后的事情。季先生还提到了北大两派群众组织都参加了去印尼驻华使馆门口游行示威的事情，两派都有租来的大轿车，季先生很愿意上井冈山的车，但“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牛棚杂忆》第53页）据查，1967年8月5日，印尼发生了1000人冲击中国使馆的事件，8月6日和7日，才有中国人去印尼驻华使馆游行示威之事。据此，到8月7日，季先生对反对派虽早已心向往之，但尚未正式参加。季先生正式参加井冈山兵团之事，还要稍晚一点。

支持或反对聂元梓，这完全是季先生个人的自由，本无可厚非。可是他在30年后写《牛棚杂忆》时，当年上山的理由已不好说了。要回避陈伯达6·5讲话，又要给自己找一个响当当的理由，于是，季先生就把1968年发生的事情挪

到了1967年。

季羨林先生与新北大公社的纠葛

读《牛棚杂忆》，随处可以感受到季先生对新北大公社的反感，这可以理解。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67年6月以前，甚至在6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并没有招惹他。按他自己的说法，公社的人还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参加了新北大公社方面举办的干部学习班（《牛棚杂忆》第54页）。

尽管陈伯达6·5讲话在北大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北大的大部分师生员工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他们对王、关及吴传启一伙的倒行逆施早有看法，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在陈伯达6·5讲话的高压下并未屈服，新北大公社虽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却并未垮掉。而且，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陈伯达6·5讲话后不到3个月，关锋、王力垮台，逃亡外地的吴传启等被捉拿归案，洪涛等人束手就擒……陈伯达6·5讲话后半年，戚本禹、周景芳一伙也宣告垮台。

在新北大公社为揭露吴传启一伙（他们的后台正是王、关、戚）而斗争时，季先生在做什么呢？当新北大公社的这一斗争遭到陈伯达的打压时，季先生又做了什么呢？如果他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可以不选边。但是，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参加了井冈山，并且当了头领，“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忙得不亦乐乎。季先生介绍他自己的派性活动时高度概括，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既然是贴大字报，又是发表演说，那么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主要观点是什么呢？说过的话有哪些是真话呢？众所周知，当时井冈山派加在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身上的主要罪状，有“分裂中央文革”、“反对潘、吴就是反对关锋、王力”、“二月逆流派”，等等，性质都很严重。季先生的大字报和演说，不会放过这一些吧？为什么不如实地写出来告诉读者呢？

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仓促中开始了揭露吴传启之流的斗争，他们知道这一斗争非常复杂，非常艰巨，所以在行动中非常谨慎，而陈伯达6·5讲话，表明这一斗争形势比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实际上是给北大制造了一个大漩涡。东语系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红九团并不希望季先生卷到这个漩涡

中去，他们劝说季先生不要参加到对立派中去。劝说工作是怎么做的，新北大公社方面的材料已无从查考，只有季先生自己记录的一段文字：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牛棚杂忆》第54页）

由此可见，新北大公社方面为了劝季先生不要参加对立派，可谓软硬兼施，用尽办法。客观地说，平心而论，这并不是想害季先生。但劝阻不起作用，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

但是，季先生参加井冈山还没有多少天，关锋、王力就倒台了。季先生如果对此略作反思，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还可以及时采取补救行动，但季先生没有这样做，结果不但遭到新北大公社的批判，也被井冈山抛弃了。井冈山还批斗了他，这真是悲哀。

季羨林先生论“自己组织”北大井冈山

季先生不顾新北大公社的劝阻，决定参加反对派井冈山兵团，“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牛棚杂忆》第55页）季先生是满怀豪情壮志参加井冈山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牛棚杂忆》第55页）。参加井冈山之后，又为当上了“勤务员”而备感荣耀，因为“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可是，他参加井冈山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哪些“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情呢？他这样写道：“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

的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牛棚杂忆》第55页）季先生在这里说的“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的“同”字，有点客气了，身为“勤务员”，应该是“率领”才对。他还写道：“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和行事都失去了理性。”（《牛棚杂忆》第3页）

正因为参加井冈山后做的是一些派性的事，“说话和行事都失去了理性”，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毫不相关，所以，季先生的心里并不踏实，并不那么理直气壮，“拍案而起”的牛劲似乎消失了，“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气概也不见了。他写道，“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牛棚杂忆》第56页）

对于季先生心中“惴惴不安”的时间段，也是不无疑问的。至少在夏天，在季先生“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时候，是不会“惴惴不安”的。那个时候，特别是从武汉7.20事件到8月下旬的这段时间，是王、关、戚、谢富治一伙最嚣张的时候；在北大，则是井冈山攻击新北大公社最起劲的时候。

季先生“惴惴不安”的起始点，应该是1967年的9月初，因为大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人有一次大的接见活动，人们发现，一向坐在台上的关锋、王力不见了。原来，他们8月底已经垮台了。随后，逃亡到外地的吴传启、林聿时等人陆续被捉拿归案，曾经不可一世的学部“红卫兵联队”顷刻瓦解，井冈山头头牛辉林经常联系的那个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也找不到了……看来，关锋、王力、吴传启这一伙人，真的是一个“反党集团”（当时的通用说法）。随着关锋、王力的垮台，井冈山用来攻击新北大公社的几个法宝，什么“分裂中央文革”，什么“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就是反对关锋、王力”，什么“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一个也不灵了。把关锋、王力拿下去，不正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

从9月初到11月底，足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心中“惴惴不安”的季先生，难道真的对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吗？要知道，季先生有几位学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在学部工作，其中一位，还曾参加了抓捕吴传启的行动。季先生如果想要了解情况，是不缺乏渠道的。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季先生除了心中

“惴惴不安”外，有没有做出一点反思呢？有没有调整一下自己的做法呢？比如辞去“勤务员”的职位。然而季先生没有这样做，至少从他自己的书里看不出来。他完全回避了这些问题，也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等了3个月，终于发动反击，1967年11月30日夜抄了季先生的家。随后，广播站发布了打倒季羨林的广播稿。这类行动当然是错误的。

次日一早，季先生就去了井冈山总部，他写道：

天一明，我就骑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么可怕呀！——他们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牛棚杂忆》第62页）

井冈山兵团对于季羨林一类老先生的这种态度，季先生其实早已知道：

……在几天以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牛棚杂忆》第64页）

季先生很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但是，井冈山已经把他抛弃了，“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

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牛棚杂忆》第64页）

确如季先生所担心的，被他视为“革命组织”和“自己组织”的井冈山兵团，尤其是其九纵，前不久还把季先生捧为“勤务员”，这会儿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勤务员”，反而翻脸不认人了，“极端尴尬的境地”并未能避免。季先生这样写道：

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牛棚杂忆》，第69—70页）

季先生还写道：

——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牛棚杂忆》第93—94页）

以上引用的季先生的文字足以说明，直至季先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之时，北大并未发生武斗，校园里的交通是自由的，季先生可以“骑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井冈山可以派摄影师到季先生家去拍摄现场，甚至，井冈山还可以“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这充分说明，季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拍案而起”的时间和理由，说的都不是真话。

舒声的文章引用了季先生对自己参加井冈山一事的评价：

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记忆》第114期第29页）

但是，对比上文所引“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和“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等等言词，读者应该相信哪一段话呢？

其实，最能体现季先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的，不是1967年夏天他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时候，而是他先被新北大公社抄家，继而又被井冈山抛弃之后，毅然离开井冈山总部，返回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当时那种“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的气概，倒真是值得尊敬的。

对季羨林先生的批斗

手头没有新北大公社批斗季先生时所用的材料，但《牛棚杂忆》记叙了三项罪名：

第一是一个竹篮子，里面装有烧掉一半的信件，说是想焚信灭迹；第二是一把菜刀，从我婶母枕头底下搜到的；第三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是在德国留学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的。（《牛棚杂忆》第66页）

这些“罪证”都是抄家得来的，公社的做法当然是非常错误的。现在来看，所谓罪证，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保存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的事是可以被上纲上线的。

抄家得来的物品里还有一个小本子，题为《待死斋札记》，从小本子中写的内容看，是在文革开始后才开始写的，其中一段文字记述说，季先生从北大西门进学校，远远看见一只王八浮在水面上，王八看见有人过来，便沉入水下去了。季先生由此生发感慨，“我要是能变成它沉下水去，该多好啊。”（大意）

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牛棚杂忆》：

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常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牛棚杂忆》，第96页）

《待死斋札记》是私人笔记，本不应入罪，但在那个年代，抄出来就成了罪

证，白纸黑字，谁也无法否认。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革命群众把你当作左派，你却在暗地里写《待死斋札记》，还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你这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在那个年代、那种气氛里，季先生自己能作何解释？井冈山九纵又能作何辩护？①

季羨林先生的“超然”

受到两派的批判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年，季先生似乎大彻大悟，对两派有了新的评价：

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污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

根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牛棚杂忆》第47—48页）

真乃“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① 本文有关《待死斋札记》的内容，为亲眼见过这一小本子的东语系校友见告，小本子内容不多，但“待死斋札记”这个标题和季先生想变成王八沉到水底下去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让见到者感到震惊，从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牛棚杂忆》为研究文革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和看法，反映了季羨林先生的认知，值得我们深思。他能把想到的说出来、写出来，成为“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与善，丑与美，照见绝望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他。

【评论】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 ——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

郑实

1968年的春季到夏季，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发生了100天左右的武斗。和清华不同的是，北大在武斗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冷兵器，即铁棍、长矛和弹弓，所以虽然受伤的人不少，但在武斗现场并没有死亡一个人。而清华武斗中，由于使用了自制的枪炮、手榴弹和坦克，武斗双方和工宣队死亡了10多个人。

但是，在武斗期间，北大校园里出现了3例骇人听闻的死亡事件。

根据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这三例死亡事件如下：

4月19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注：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①

4月27日，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径“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24岁。（第787页）

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

^① 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87页。

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被武斗队打死。时年24岁。①

这三起死亡事件都不是发生在武斗现场，这三个死亡者也都没有参加武斗，为什么会被活活打死？打死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人？由于当时掌权的校文革的包庇和隐瞒，北大的师生们并不清楚。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对以上三起事件开始进行调查。1969年9月北大成立革委会和1971年5月成立校党委后，又继续进行了调查。

1972年9月2日，校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对“文革”中打死温家驹、刘玮、殷文杰的几名凶手的处理意见（经校党委、校革委会扩大会同意上报）：

李喜才（打死温家驹的主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

秦克俭，属敌我矛盾，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开除其党籍。

李铁良（打死刘玮的凶手），性质和处理同秦克俭，开除其团籍。

杨恭谦（刺死殷文杰的主凶），不再重新处理。

黄××，已查实是贪污分子，参加策划武斗，定为坏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开除其党籍。②

这个决定把犯有刑事罪行的杀人凶手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仅给予戴上帽子（或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开除党籍团籍的处理，显然是太轻了，这也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对凶手杨恭谦，因已经毕业分配，竟然不再重新处理，更令人不可理解。

1973年5月19日，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家属参加的“批斗杀人犯大会”，当场宣布对文化革命中打死温家驹等三名学生的四名杀人凶手的处理决定：秦克俭，开除党籍，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李才喜，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李铁良，开除团籍，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以上三凶手由公安机关当场宣布了逮捕令，逮捕归案（这三人处理，北京市委3月份已经批准）。

令人不解的是：会上宣布：“孙××，因态度较好，从轻处理，送劳动教养。另外，刺死殷文杰的主要凶手杨恭谦，分配前处理较轻，决定将我校对以上四人

① 同上，第789页。

②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843页。

的处理结果告杨现在所在单位，由他们根据政策处理。”^①1973年，文革时期在校的老五届学生早已毕业离校，所以也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4月1日，北京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隔离审查。4月5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对贺彦生进行刑事拘留审查的请示报告》。4月6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提出运动的五条政策界限，其中（一）对于追随林彪、四人帮参与聂、孙反党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和打人致死致残的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组织者，这是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要严肃处理。^②

1978年11月8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法办杀人凶手杨恭谦的请示报告》（杨恭谦是“文革”中杀害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的主凶）。^③

12月1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法办杀人凶手舒会文的请示报告》（舒会文是“文革”中打死刘玮的主犯之一）。（同上，945页）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参与这三起杀人事件的凶手有：秦克俭、李才喜、李铁良、杨恭谦和舒会文，其中李喜才是打死温家驹的主凶，杨恭谦是刺杀殷文杰的主要凶手，李铁良、舒会文是打死刘玮的主要凶手，凶手秦克俭的具体罪行不详，贺彦生的具体罪行也不清楚。后来他们被判处多少年徒刑也不清楚。至于纪事中提到的孙××和黄××，在三起案件中的作用，更是语焉不详。

关于北大武斗中死人的事件，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在北大的武斗中，没有打死人。地质地理系学生刘伟（注：应为刘炜）不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而是在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是冤枉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殷文杰的死也是冤枉的。三·二九校内武斗的第二天，他路过四十四楼，有人喊‘他是井冈山过大江的！’被两个公社战士刺死。当时在场的公社办公室副主任胡宗式曾奋力去阻止那两个战士未能制止。死人的问题，我没有指使，从法律的角度，我没有责任。”（聂元梓回忆录，第271页）

聂元梓关于刘炜被打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是完全错误的，刘炜就是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打死的；关于殷文杰之死，她说错了时间，也极力开脱自己的责任，

^①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855页。

^② 同上，第933页。

^③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944页。

其中提到了胡宗式曾经制止但未能奏效。

2014年5月31日的《记忆》杂志114期上刊登了胡宗式的《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使我们对殷文杰的死亡事件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处理者之一的胡宗式的回忆，披露了1968年4月27日殷文杰被刺死的现场情况，使读者了解到了一些当时的真实情况：殷文杰本人并没有参加武斗，只是路过44楼，被新北大武斗队的骨干“钢一连”的成员截住，他企图逃跑，却被杨恭谦和高玉堂用长矛追杀，身上刺了39个伤口，后被胡宗式等人送到721医院，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胡宗式等人还参加了事后处理。胡宗式作为当时的见证人，写出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实，使读者了解了当时情况下无辜学子被刺死的血腥事实，加深了对北大文革历史的了解和对文革残酷性的认识，比起长期以来聂元梓否认自己的罪行，对北大文革中的死亡事件推脱责任，无疑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读了胡宗式的文章后，感到该文虽然披露了一些事实，但还有些问题说的不够清楚，使读者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里提出与胡宗式和关心此事的北大校友共同探究：

一、 刺死殷文杰的凶手究竟有几个？他们是谁？

在胡宗式的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指出：刺死殷文杰的凶手是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胡宗式手抓住枪尖并用肚子挡住了一个凶手，那么刺杀殷文杰的主要凶手应该是另一个人。在721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写着殷文杰的身体上有39处伤口，难道都是那一个人刺的吗？一个人在短时间里能够刺杀39枪吗？人们有理由怀疑，一定还有别的凶手共同参与，那其他凶手又是谁呢？更为诡异的是，在《北京大学纪事》中的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高玉堂的名字，只有杨恭谦的名字。他毕业时被顺利地分配，直到10年多后的1978年11月8日，校党委才向北京市委报送了《关于法办杀人凶手杨恭谦的请示报告》。那么高玉堂是否是刺杀殷文杰的凶手？他是否长期逍遥法外？还有谁参与了刺杀殷文杰？这些事实胡文并没写清楚。

二、为什么舍近求远，把殷文杰送到 721 医院？

在殷文杰被刺成重伤后，作为当时学校权力机构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没有进行及时抢救，反而做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行为。本来，北大的指定医院是北医三院，距离比较近，医疗力量也很强，凡是北大师生得了重病或受了重伤，都是送往北医三院的，例如在此之前被新北大公社打成重伤奄奄一息的樊立勤，就是被送到北医三院，被抢救过来的。可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却让当时在现场的胡宗式等人，舍近求远，把殷文杰送到距离很远、技术力量也不如北医三院的 721 医院，这是否是有意延误和企图隐瞒公社的罪行，以致造成殷文杰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为什么不告诉死者家属真相？

中国人有个老传统，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在殷文杰死亡后，新北大公社却欺骗死者家属，不等死者家属来京，见上死者最后一面，就焚尸灭迹。28日新北大公社把遗体拉回北大，29日就匆匆送到火葬场，30日他们就借口火葬场“五一节”前不给保留遗体，急急忙忙地把殷文杰的遗体火化了。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又是为了什么，是否害怕死者家属看到殷文杰身上的39处伤口，有意隐瞒凶手的凶残罪行？

胡宗式文中说：“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豪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由此可见，新北大公社的某些人在殷文杰死后依然欺骗死

者家属，不告知殷文杰的死亡真相。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可怜的死者家属也无处伸冤。

四、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的表现

胡宗式文章中说：“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楼2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44楼2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8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聂元梓批示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在文革中，聂元梓依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资本，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成为校文革主任。她在北大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其组织的专业武斗队伍，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凶狠残暴，随意抓人打人，以致发生了打死三条人命的事件。这三起事件不是孤立偶然的，是聂元梓和校文革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恶果，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和校文革难逃其罪责。

平心而论，刺死殷文杰的凶手也不是天生的心狠手毒的恶人，他们只是受到文革极左路线毒害，受到聂元梓极左政策影响，丧失了理性和人性，把不同意见的同学当成阶级敌人，以为自己的行为是革命的表现，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他们是凶手，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也是古稀之年了，他们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彻底忏悔，也应该认识到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顺便提一下，在北京大学纪事843页中提到的贪污分子黄××，就是胡宗式文章中说的参与殷文杰事件处理的新北大公社的总部委员黄元庄。这个黄元庄文革前是个食堂的炊事员，文革中担任聂元梓的保镖有功，被聂元梓封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经常在校园里动手打人，武斗中担任副总指挥。文革后期（1975年8月）被查出在监督改造期间盗窃公物和乱搞男女关系，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①这样一个品德恶劣、人格低下的坏分子却被聂元梓信任，主持了殷文杰死亡的事后处理，如果能够处理好那才是怪事！

清华大学校友唐金鹤女士，耗费三年时间，写出一部《倒下的英才》（2009年，科华图书出版公司），详细地记录了清华武斗期间死亡人员的姓名、时间、地点和具体细节，并绘制出《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期间遇难和重伤人员位置示意图》。而北京大学武斗期间死亡人数比清华少得多，但死亡事件的真相却至今没有得到比较详细的披露。这对于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希望知情的校友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

^①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899页。

【述 往】

编者按：本书的作者郝斌，1934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1966年7月，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讲话，诬蔑他迫害女儿李讷。从此，郝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北大“牛棚”中度过了三十个月。1978年始获平反。2013年，从北京大学副校长任上退下来后的郝斌，在台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全书包括楔子和附录，共十八节。《南方周末》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民间历史网站选载了其中的五节，本刊将陆续刊发余下的部分。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郝 斌****楔 子**

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先说“黑帮”这个词吧，人们最早看到“黑帮”二字，是在《人民日报》上。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同一版面，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后者，一篇千字短文，六次重复使用了“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那个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捧读《人民日报》，大多心怀崇奉和信赖，长年都以一种自觉的虔诚，将它视为行动的指南和意识修养的引导。而“本报评论员”这个不具姓名的名义，则另具一种权威性，它往往比这张报纸的位阶还会高出一头。这一点，我们尽人皆知，但都不便言明。以此缘故，评论员的文章更罩上了一层神秘之感；再加上“黑帮”这个词语特具的新鲜感和煽动力，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尽管后来每人头上各有自己的“帽子”，却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因此而被叫做“黑帮大院”；疾风暴雨之际，横扫进来一些人，后来发现他们只是小小萝卜头，于是就叫他们“黑帮爪牙”。不过，那个时候的“黑帮”一词，在外地外省的感觉之中，几乎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于己并无关系。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身边的人陆续被揪出，成为好大一支队伍，“黑帮”这个词反倒没有叫开，却为另一称号“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词是康生给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主席给起的，命名者的阶位高低，可能是一个因素吧！如今的我们，已经是佝偻蹒跚，心如古井，对人对事，没有当年那么多政治神经和敏感度了。如果拿“黑帮”与“牛鬼蛇神”做个比较，也许从社会语言学、传播学的角度看，它们还有一点区别和探讨的价值？不过，这两个词，从语义上讲，都没有什么质的规定性，都是一个大箩筐，可以装进任何想装的东西，比较而言，后者的包容性也许更大一些。如果同“地富反坏右”相比，这算是一个延长和发展。我因身在这个队伍之中，别人用哪种称谓来呼唤我们，都觉得相差无几，实在分不出他们的优劣高下。时到如今，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全国揪出来的人足过千万，唤做“牛鬼蛇神”的居多，唤做“黑帮”的只是北大、清华一家、两家。既然如此，今日不过谈昔说往，理当从俗从众，就叫

“牛鬼蛇神”，也算大家方便。

再来说，“牛棚”。“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才被叫做“牛棚”。后者虽从前者衍生而来，但语义已有不小的变化。“文革”初起之时，对我们“黑帮”人等，千夫所指，千目所视，简直达到了人神共愤、天地难容的地步。“牛鬼蛇神”一词，那是绝对的贬义，政治性的贬义！那个时节，“牛棚”这两个字，还不可能使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朋友中，谁能有这种闲情和浪漫，去做如此的戏谑和调侃呢？！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只消如此一谑，说不定他自己就会被打入“牛棚”。“牛棚”一词出自何时，我无从知晓。三年以后我出了“牛棚”，才从几位红卫兵小将嘴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他们把一位同学称作“牛倌儿”。那时我对“牛棚”以外的语言生疏隔膜，还以为那人出身农家、儿时放过牛的缘故。听过几次之后，我方才回过味来：原来他是我们“牛棚”的监管人员。这一悟，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说起来，这已经到了1969年的夏天，其实，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北大学生中已经成为普遍症候。

两个语词带过不提，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他们在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间，因被指为“黑帮”，停职待罪，多是口头或者笔头交代自己的罪行，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七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师生员工万人大会上宣布赶走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校内各单位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编制，有制度，有管理，减工薪，拆电话，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只不过这期间“牛鬼蛇神”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上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有个喘息的空档。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二百余名“牛鬼蛇神”集中食宿，分别批斗和劳动，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档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这就是我要在这里叙述的故事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二十三个“黑帮”被押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自此进入了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一九六七年春夏，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曾被“松绑”五六个月，而后第二次被赶入太平庄。从“文革”爆发，历史系揪出第一批“牛鬼蛇神”，至一

九六九年夏，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三十个月。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撤销，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①只有两位年长的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有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七老八十的已经打不住，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正是：闲坐细数牛棚事，岂容青史尽成灰！

“阴阳头”旋风

“历史系文革委员会”是直接管理我们的“红色权力机构”。它规定，“牛鬼蛇神”每天早晨八点要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委员会”所在地列队集合，听候点名，然后有学生把我们押到学校的某个地方劳动。下午两点，亦复如此。押管我们的学生通常是两名。

还是在阳台下跪之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的某一天，我们照例来到三院，正在聆听训斥之际，又进来三四个学生。他们相互嘀咕了几句，训斥停了下来。来人中一个手里拿着个小布包，另一个搬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从被批斗以来，凡在学生面前，我们总要低头站立，这已经很有一些日子了，此刻忽然受命坐下，情知不好受用，我身子坐了下来，心里却上下忐忑。只见来人打开小布包，亮出一把理发推子和一把剪刀；另一个上来按住我的头，喝令我不许动弹。

“啾啾！啾啾！”头发一缕一缕掉了下来。我明白了，此刻应是“留头或留发”的选择之际，意识告诉我，要选择留头，因此老实听命，没有一点挣扎，但也说不上情愿配合就是了。时间不长，作业完毕，我被喝令站起，立在一旁。接着，范达仁被喊坐下。

我的头给理成了什么样子，心里很想知道，但站在那里的我，却硬撑着一动不动——我不愿意抬手去摸。此时此刻，我还能做什么呢？两手下垂，尽量摆出自若的样子，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您也许不能理会，这是我保持自尊的唯一方式！当时我跟监管学生还较着劲儿，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战场上的对垒，既然已经无力反击，只顾去抚摸自己的伤口，又有什么用呢！给人看见，倒显得撑不

^① 除下文提到的“文革”期间从系里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太平庄“牛棚”一度还关押过几个从南口农场转来的原历史系的“右派”学生。

住。等到范达仁站起来，我定睛一看，乖乖！他的头上，剃了右一半，留了左一半；留下的一半，又是毛毛茬茬，这个景象，旁人看了，大概会哭笑不得，可我们当事人呢？我们让人折腾近一个月了，已经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回连三分人相又去了两分，此时此刻，倒是有九分像个鬼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竟不知道自己头上的发型，还有个名称，原来那叫“阴阳头”！就这样，当天在三院，被剃成“阴阳头”的还有徐天新、吴代封、夏应元、孙机、张胜宏等人。后来，押管我们劳动的学生在一旁不停地催促，嫌干活的时间耽搁太多，给我们理发的学生才算罢手，向达、杨人梗、邓广铭等几位老先生，也才因此幸免这一剃之辱——不过，他们站在那里，眼看我们一个一个受剃，又时时担心喊到自己的名字，那番情景，简直如同陪绑法场一般，恐怕这种折磨，也不比我们受剃者好过多少！

当时正值酷暑，我们每人都戴了一顶草帽。到这个时候，真要感谢这顶草帽了！它不仅为我们遮阳遮雨，还在校外来人面前，替我们遮住了一点羞辱。拉出去劳动的时候，我把草帽压得更低，可是，身上觉得很难过，原来头发屑进了衣服，又被汗液黏住，弄得上身刺痒难忍。身上蒙刺，心里蒙羞，这一天全在苦挨中度过。熬到劳动结束，赶回集体宿舍十九楼，我换上一顶布帽，直奔校园的理发店。谁知道，刚进店门，没等我说话，理发师傅就冲我摆手，说：“快走，快走！我们不理！”我先是愕然，又复恍然。原来，在我之前，已经不止一个“阴阳头”来过；而且，同我一样，大热的天，头上捂着一顶布帽，还有一脸的晦气！不然，理发师傅何以不等我脱帽、开口，就要厉声拒绝呢？这是一间仅对校内开放的理发店，学生出入很多。说来也是，学生要把我们理成“阴阳”发型，理发店怎敢违拗，硬跟学生们对着干呢？这位理发师傅，声色虽然严厉，但从他的脸上和语气中，我能感到，他只是维护店铺，并无意与我为难。

我不及多想，抽身直奔海淀——海淀镇上有一家理发馆，那是为市民开设的，价格稍高于校内福利性的理发店，学生很少光顾。那里才是该去的地方，我怎么早没想到呢？走出西南校门，过马路进入南北向的小胡同军机处，对面来了徐天新，他的头上也是一顶布帽。见了，他用手指指帽子，又摇了摇手，动作都很小心。胡同很窄，走到擦身之际，他悄声说：“都不敢理，往外轰！”我才知道，海淀街上的这条路也走不通了。不过，这时候，还要顾及如果当即折回头，与徐

天新并肩同行可能惹来麻烦，因此，我又往前走了几步，直到两人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才转回身，走出胡同，再向东走一段路，进南门回到学校。

这时候我才得知，那几天给“牛鬼蛇神”剃“阴阳头”的，何止历史系一家！原来北大各系都有；又何止北大一校！原来北京市各校都有。那时霎时间刮起来的一股“旋风”，只刮得各处理发店视“阴阳头”犹如灾星进店。听说真有几家胡同里的小理发店，因把“阴阳头”改剃成光头而被兴师问罪，甚至店铺被捣、师傅遭打的。

那个时节，与强剃“阴阳头”同时刮起的还有另一股风，叫大破“四旧”。

“四旧”指的是“旧风俗、旧习惯、旧传统、旧意识”。至于“四旧”如何界定，那就全凭大破“四旧”的主角——红卫兵说了算，甚至全凭来到你家造反的那十个、八个或三个、两个红卫兵说了算！只要是胳膊上套块红布、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人，说了都算！一时之间，从过肩长发、旗袍、戒指、手杖、烟斗，到蓄发、祭祖、拜佛等等，全被视为“四旧”，都在要破之列。周一良先生的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铤金戒指，那时他与夫人邓懿的婚戒。我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站在讲台上的周先生抬起手来的时候，会闪出一点亮光。如今，大破“四旧”之风已经刮了好几天，周先生拔草、扫地，伸出手来，还见那一点亮光，难道周先生不知道这会惹来麻烦？果然，有学生来问了，周先生连忙回答：“我知道，这是四旧，该破掉！戴上去二十几年了，指关节变粗，退不下来了。我一定想办法，想办法！”还好，那个学生没有进一步无礼。第二天，周先生的手上真的不见了那枚戒指。等干完活儿，座谈改造体会的时候，周先生说，头天晚上，他到海淀一家铁匠铺，央求一位师傅帮忙，说明这是“四旧”，无论如何要破掉才好。铁匠师傅小心翼翼，用锯子把戒指锯断了。周先生说，他非常感谢这位工人师傅，言下不胜释然。我们也觉得那个让人担惊受怕的“闪光点”，总算消除了，为周先生松了一口气。可是，三十二年之后，周一良先生在他的《郊叟曝言》里重述了这段往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几十年憋屈在心里的一腔悲怆、惋惜和无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与周一良忍痛断婚戒相类似的事情，当时我们还听到几件。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有一位副教授沈乃璋，我入学之后，有人曾把他指给我看——当年的沈先生四十多岁，一手拿着个大大的烟斗，另一手提个“司提克”（stick，手杖），脸上

一副浓黑的山羊胡，走在校园里十分神气，惹得学生常常停步注目。如今，这些惹人瞩目的东西，全成了“四旧”，一下子破了个干干净净！沈先生有生以来，一直生活在尊严与优越之中，此时的屈辱与损害，确实没完没了，他怎么承受得了呢？“文革”事起三个月之后，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他竟仰药而死，年仅五十五岁。冯友兰先生，人们都知道他有一副美髯，足够半尺之长。美髯与他宽阔的额头相配，正是一位东方智者的形象。他当时同样遇到了“留须还是留头”的课题，他断然把一副美髯付予了剪刀和字纸篓。事隔三十年之后，当我读到他晚年的力作《中国哲学史》七卷本的时候，突然感念多多：幸亏当年他承受了那割须之辱，否则，今天哪能有这部著作留世！

写到这个地方，我不免把当年存在心理的疑问提出来：强行割须、剃发，难道不是“旧意识”的反映吗？莫非其中存有什么除旧布新的革命性含义，值得去大事张扬？

战国以后，中国出现过一种“髡刑”，也叫“髡首”，就是把犯人的头发强行剃光，用以惩治犯有“罔上”之罪的人，“髡笞”、“髡流”、“髡钳”、“髡劓”、“髡头墨面”等等，都是先剃了头发，再配以其它刑罚的名称。学生来给我们剃头，不言而喻，首先是把我们视为“犯人”，可以任意摆布；除此之外，剃而不光、留下一半，再配上“阴阳头”这个名字，不需多想，里面已经加了一层恶少恶搞的成分。这同三院大门上的对联，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名称、剃发，正可谓上行而下效，异曲而同工罢了。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里，描写俄国流放犯、苦役犯的时候，倒是多次提到，犯人被“剃光半边头发”。那是为了便于识别、追缉在逃的流放犯。逃犯就是在解冻的季节，也要用半年的时光才能走出茫茫的西伯利亚，而那被剃去的半边头发，无论如何来不及与另一半长齐。可我们呢，我们就是没有被剃，又有谁敢逃跑呢？早已陷入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的我们，如今完全成为恶少恶老拿来寻开心之物！

那天我回到宿舍，凭一把小剪刀和一面口袋里装的那种小镜子，把剩下的一边头发剪短。做这件事，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一手拿起剪刀，另一只手提起头发，再没有第三只手去拿镜子了。圆镜没有镜架，支不牢靠，难免晃动；一晃动，就对不准头发。因此，剪刀下去，多一半是凭感觉。剪到哪儿算哪儿吧，只要阴阳混沌，反差不太分明也就算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按时来到三院集合。列队点名的时候，头上的草帽必须摘下来，放在背上。我们彼此一看，又是一个不得笑也不得哭！我们个个都变了模样。没被强剃的几位，不约而同，都理成了平头——可别小看了这半寸平头！作为过来人，我一眼就看出这个发型的多重功能和非凡含义：被人揪一把的危险完全免除，被强剃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留下的半寸，则是被剃者绝非自愿的一个表征！如果看到一个人剃了半寸平头，便可大致判定他原来的职业和当下的政治身份，但这半寸头发，也把我们最后的一点自尊，浅藏（不，深藏！）在了里面！

前面提到，我们“牛鬼蛇神”当中，有一位女性——陈芳芝，她是广东汕头人，生于一九一四年，这时候五十二岁，一直单身生活。她小学、中学在天主教会学校和香港教区学校读书，后来考入燕京大学政治学系，读了本科，再留学美国。一九三九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任教。抗战爆发，她辗转入蜀，在成都燕大执教；抗战胜利以后，燕大迁返北平，陈先生担任燕大政治学系主任。一九五二年，中国的高等院校有一次结构性的调整，院系解体，重新组合，动作很大，其中政治学、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干脆取消了。前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后者，被认为是鸡零狗碎构不成体系的非科学。此后的二十七八年，在高等院校的学科目录中，一直不见它们的名字，当然更谈不上招生上课了。心理学的境遇稍好一点，虽有唯心主义的嫌疑，不再独立成系，但还可以在哲学系的屋檐之下，作为一个专业，少招几个学生，开班上课——不过，这只限于北大、复旦两家。话说回来，那次院系调整当中，燕大的政治学系取消了，陈芳芝栖身无所，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所用终非所长。到一九五四年，因她在燕大时从政治学角度，钻研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问题，积有年月，与历史学能沾上边儿，即烦人说项，改调到北大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担任教授。这回专业算是对口了，但很少让她上课。我记得，她只给几个学生讲过专题课。一九五八年，我本科毕业，留在近现代史教研室当助教，每逢政治学习，一说到相关的话题，陈先生总要检讨自己有“买办思想”，可她说得不清不楚，我也听得不明不白，至于她为什么以“漏网右派”罪名落入“牛鬼蛇神”队伍，我就更说不清了。她单身一人，平时生活优裕而单纯，当校外来人围起我们时，她真是惊慌万状，谁见到她那个样子，都不能不为之动心。因此，三院患难之际，我们“牛鬼蛇神”也要挺身出来，把她围在中间。就连几位老先生也不例外。

在我被剃成“阴阳头”之后几天，陈芳芝的发型才变了样。说来，她的头发也就是比我剃去之后的略长一些，比我原来的，却短过许多。这个时候的她，就连当时“飒爽英姿”、“不爱红装”的女红卫兵们，也难得赶上了！她怎么弄短的呢？我猜想，她是熬到星期天去理发店理过的吧？孤独一个人，有谁能来帮她一把？头发奇短的她，这个时候在我的眼里，突然增出几份生疏感；她本人此时的心境，又该如何呢？

我也是熬到星期天回到家里，爱人用剪刀细细修理一回之后，才算可以脱帽见人。修理的时候，头发屑和爱人的眼泪，一起调到我的胳膊上，我有点凄然；理完之后，对镜一看，镜里的自己，也有几分生疏。

正是：须发一半强梁剃，男儿从此不冲冠？

【述 往】

一个普通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二）

李 檀

五、上山反聂

毛搞起的全国大乱，一开始按照他的愿望，冲垮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动堡垒。打垮这些人就靠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原本是理念上的差异，方法上的不同，工作中的分歧，或者最多就是写不团结，被无限夸大，无限上纲，说成路线斗争，道路斗争，阶级斗争，敌我矛盾，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置于死地而后快。更有甚者，很多是无中生有，网罗罪名，编造事实，诬陷造谣。

造反的群众靠着这个法宝所向披靡，取得一个个轻而易举的胜利，帮助毛打倒了走资派。全国人民毛泽东思想学的好，把制造冤狱打倒政敌这一套都学到了手，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开始用此对付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了。任何小的分歧，都要搞得不可调和。文过饰非，嗜权如命，栽赃陷害，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大泛滥。结果是群众分了派，山头林立，个个唯我独革，派仗升级，愈演愈

烈，进入全面内战，

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也可以点灯。在中央叫路线斗争，在下面就是派战。派战一起，就由不得老毛了。运动开始，他曾设想半年。到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他还在说，运动时间两个月，或者多一点。事与愿违，这匹脱缰的野马没有慢下来的迹象。群众情绪意犹未尽，派战烈火方兴未艾，开始玩不转了。

从一九六七年初，文革进入了控制与反控制的阶段。毛抛出几招，引导运动进入他的轨道。

上海夺权，是一个重大部署。张春桥指示，以产业工人为主，不要让红卫兵操纵，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大学生们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宣传机器大力鼓吹大联合，解放干部，斗私批修。结束大规模的大串连，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当时上课还不可能，先回校搞军训，大家陆续返回，呆住，收心。学校又热闹起来了，有了人气。那一年春节，国务院发通知，“应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不放假，从此多年“今年春节不放假，要过就过革命化”。我们当然也没了寒假。2月10日，军训部队进校，一个部队排长领着我们天天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我们大学毕业后也是这个级别，不拿他当回事。隔三差五早晨来个紧急集合，每个人都有个专门捆好的行李包应付着。

经过大串连“洗礼”的北大学生，饱看了各地的乱局。学校表面的平静不能掩盖他们心中的躁动。为什么全国都在大乱，我们却在死水一潭？为什么全国都是两派，我们还是一统天下？过去全国学北大，现在北大要学全国了。不能独善其身，世外桃源，走向一分为二，这是大势所趋。学生中蕴藏的能量，只能通过派战来发泄。

北大是起了个大早，现在要赶那个晚集了。

在有些系，本派就有争论问题，比如中文系高吕之争，经济系围绕着杨勋的评价，早有了分派的雏形。有些则基于理念、出身、地位等等先形成小圈子，时候一到，各自站队。

我们“0363”在文革前，不管出身好坏，是不是干部，大家相安无事，和谐相处。文革一来，围绕着出身，对工作组的看法等，有了分歧。出身好，当过学生干部的一些“优势群体”，认为自己是“左派”，拉出队伍，要鹤立鸡群。我们一班刘XX，以前当班主席，文革前夕得知农村中农的父亲只是个养父，而亲

老子正在山西某地当局长，原来自己是“官二代”，理所当然当核心，于是拉了八九个人，他当头，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星星之火”。另外两个班的左派同学，以出身好和班团干部为主，也成立战斗队，后来三支合并，通称“0363红旗”。我们班剩下的约三十人，被迫接招，也组织起来。取名“115师”，师长三人，吕成信以前是白丁，出身下中农，有号召力，管组织，对外联络；我当过班干部，有人缘，管写作，发表大字报。还有一个蔡小海，我们这里唯一纯正贫农出身，办事死认真，后来主要在一个全校性的“斗私批修”战斗队活动，二十来人，包括胡德平。

二班的“被淘汰分子”在陈醒迈、齐菊生旗下组成“北京公社”。这个词来自毛对聂等大字报的批语，开始大家还以为有什么深刻含义，后来毛绝口不提，原来也就是脑门一热的话，人们也就忘之脑后，陈醒迈捡了起来。三班的剩男剩女们，则在樊能廷发起之下，成立了“慨而慷”。

这时，北大已经进入战斗队为主体组织形式的阶段。大家都“穿上马甲”干革命，隐去真名写文章。

我们年级这两派战斗队起初说不上有什么观点不同，都是聂元梓的顺民，只是各行其是，分别活动，互无往来。道不同，不相与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校文革刚成立不久，学校就出现了第一次反聂浪潮。事实上，从5.25大字报，到反工作组，虽然她两次站队正确，质疑声仍不绝于耳，主要是她的人品。10月初，成立了地球物理系魏秀芬哲学系胡纯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哲学系张志握俞启义为首的“红联军”（红色造反联军），说聂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他们的大字报可能贴在其他食堂附近，我从不过去，基本没看见过。脑子里已经先入为主，聂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那些批评不关心，没兴趣。我和我们“115师”的同学基本都是逍遥派。

聂在文化大革命中拔得头功，是毛钦定的大左派。中国人向来很有“头功情结”，比如奥运会就特别看重头枚金牌。但聂的地位有些尴尬。这颗新星不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靠“上层斗争”发家，没有和学生生死与共的经历。她是“学生领袖”，但不懂得学生，因为自己不是学生，甚至没上过大学，而是“三八式”干部，38年17岁就入党时，中学没念完，后来只是在人大和党校上过培训班。1952年全国第一次定级，31岁的她就是行政12级，属于高干（我31岁农村教

师，行政24级，人比人，气死人啊）。1960年来北大，算外来户，掺沙子。

我相信聂是真诚要跟毛干革命的。谁料这个革命本身是中国一大祸害。命运把她抛到了风口浪尖，被文革的大浪推着走，而她本人性格上的缺欠也在这个地位暴露得淋漓尽致。过去说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实际上文革把人变成鬼。和其他所有政治暴发户一样，她不可能有民主意识，甚至不可能民主作风，靠政治暴力上台，任人唯亲结帮拉派是这些人的通病，很多坏事由此而生。

聂元梓赶上过延安整风，要照猫画虎，向毛学习，搞北大整风，口号是“上揪下扫”，目的是让批评她反对她的人闭嘴，走路。上揪，要揪李雪峰，下扫，把批评她的学生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全校开了四次“上揪下扫”万人大会，活跃一时的反聂学生赵丰田、胡纯和、魏秀芬、马洪路等打成了反动学生，井冈山、红联军定成了反动组织，其成员有二百多人遭到批斗，这两个组织到12月份已经解体，第一拨反聂失败。

胡纯和的“井冈山红卫兵”还加入过三司。1967年1月21日，三司总字一号公告宣布其“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予以除名（8月17日大联合的“井冈山兵团”成立时，已经停止运作的三司又为其平反）。

聂元梓在校文革内部也搞一言堂，以自己为核心划线，排除异己，引起了当年“社教左派”的分裂，带来上层剧烈振荡。10月24日，在几名反对者缺席的情况下，校文革常委开会决定增加她的铁杆好友孙蓬一为副主任。接着，把登过反对她文章的校刊主编杨克明职务解除，又胡乱找个借口把批评她的杨勋送入大牢，把孔繁赶出校文革，被赶出的还有国政系的廖淑明和物理系的聂孟民。

12月14日，副校长周培源在29楼北墙贴出大字报，“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的公开信”，洋洋万言，温和地批评了聂听不得不同意见，唯我独左的做法，希望她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有些干部，如段学复、黄昆、麻子英，适时给以解放。周和聂是当年反陆平的左派战友，坐同一条板凳。5.25大字报后，周培源还兴奋地说：“北大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但聂已经箭在弦上，铁了心要在北大也来个炮打司令部。1月10日，《新北大》报发表李清昆的文章，“孔繁、杨克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1月21日，全校大会批判孔繁。2月24日，《新北大》再次发文，说孔杨“操纵群众，恶意中伤”，“对这样的坏

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清除出去。”

事态越来越眼花缭乱。北大社教时左派的带头人张恩慈也起来反聂。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大字报：“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郭是西哈努克亲王的王子的老师，西哈努克是当年中国屈指可数的国际友人之一。这让他的地位特殊。在1965年北大社教他是聂坚定的朋友，曾有“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的豪言。在他的倒戈大字报中，还揭发聂元梓涂改录音带事件。

事情的原委大概是：不久前，聂元梓临时取消了到反对派大会听取意见，转而参加了一个支持者的大会。在会上她说：“我不能登他们的讲台，我要在这个无产阶级讲台讲话。”引起反对派强烈反弹。聂指使别人做手脚，涂抹了录音带，对别人的指责予以否认。

这件事发生在1972年尼克松“水门事件”中涂改录音带五年以前。当然在中国，小事一桩，谁也不能奈老聂何，但这让很多人认识了她的另一面。

同一天，两位学生校文革常委，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和图书馆系研究生侯汉清，也贴出大字报，批评聂在校文革内独断专行唯我是从的表现。这对我们影响更大，因为校文革常委中统共只有这两名学生，他们与聂没有任何个人恩怨。

这个时期的聂元梓，不光在校内这一亩三分地忙活，眼睛还盯着上面外面，瞄准更大的权力和名声。1967年1月17日，她和蒯大富联手，还拉上了著名“红色洋人”，中共的唯一外籍党员李敦白，组织“北京造反公社”，宣布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这个事没有做大。后来，北京三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在筹备联合起来，成立红代会。一司出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二司出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三司出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因为北大没有红卫兵，本来没聂元梓什么事。王大宾想以三司为主，他们当时声望最高，普遍认为造反精神最强。谢富治不同意，因为有一个半老徐娘，身份是革命干部，手下又没有红卫兵，但是一定要参加，这就是聂元梓。

2月15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全校性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社长叫卢平，聂没有职务，但是作为它的法人代表（原文如此——本刊编者），这就为她进入红代会扫清了障碍，拿到了筹码。2月20，首都红代会成立，三个司令部寿终正寝。聂阿姨如愿以偿，“老

子的队伍才开张”，就当核心组组长，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新北大公社的成立，开始了北大下层的分裂。一部分人，是“公社”的，尾随在聂的周围，革命派。另一部分人，是“非公社的”，被边缘化，打入另册。我想起了江青来北大时讲的一句话：“革命的跟我们在一起，谁不革命谁走开”，聂又要搞“左中右”这一套了。化学系成立了公社红三团。“03红旗”战斗队是它的成员。我们本来一直是支持聂元梓的，现在被拒之门外，还能热脸贴冷屁股吗？别无选择，只能对着干。聂元梓就这样把大批人推到她的对立面。

首都红代会一成立就陷入了分裂。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首先因揪斗彭德怀结下梁子，愈演愈烈，两校只隔一条马路，双方架设高音喇叭，隔空骂战，不共戴天，成为“天派”、“地派”。由于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两个学校内部始终没有分裂。聂元梓和谭厚兰则为教育部夺权互不相让，成为冤家。聂、蒯加入了天派阵营，王大宾与蒯有旧情，不去动他，专搞聂元梓，来北大挖墙角，扶持反对派。

4月11日，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来北大游行，六辆宣传车，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声援反聂，新北大公社砸了他们的车，发生冲突。4月12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副主任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把批评聂元梓说成反动逆流，“砍旗”，要“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到什么人手里。”孙蓬一这个人，是个转业军人，锋芒毕露，铁腕强势，做派高调，性格张扬，爱他的为之痴狂，恨他的咬牙切齿。他突然话锋一转，拿谢富治说事，因为他们认为谢是地院东方红的后台。他含沙射影，说要识破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摘桃派”，“我们的口号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土必夺，寸土必争。”这个讲话极富煽动性，支持者全场沸腾，群情激昂，而我对他的张狂轻浮相当反感。

当时北京市正在筹划成立革委会，聂元梓胃口很大，既是文革元勋，主任一职势在必得，不能半途杀出程咬金，让谢摘了桃。孙的讲话是为聂夺权造势。

次日晚，在大饭厅展开辩论，反聂派亮相，说聂执行了资反路线，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文革初期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据，诸如凡是错误的领导就可以抵制啊，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就是对待群众运动的试金石啊，革命小将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啊，一副毛的话必从的口气。而保聂的人一口咬定聂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人，这杆大旗不能反，不能倒。反聂就是干扰运动大方向。

陈醒迈初露头角，他本来一直是“支持聂元梓整风”的，还在串联会上与樊立勤辩论，现在从保聂转为反聂，有揭竿而起反戈一击的味道。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也带动了一大批人。他并不算很能言善辩，但不怵头大场合，人来疯。那时候要当学生领袖，能忽悠、好口才才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次辩论还留下了郭罗基的一句名言，他说，聂元梓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跪在她的脚下，“跪着的人们，站起来吧！”

“0363红旗”是铁杆“聂粉”，我们“115师”则针锋相对，走上反聂道路。从此北大学生围绕对聂元梓的看法选边站队，有了明显的两派对立。

“孙蓬一炮打谢富治罪责难逃！”“聂元梓反对谢富治绝没有好下场！”大标语席卷全校。在文革中，要打倒一个人，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是最狠的杀手锏，能置敌于死地。我们以为捞到这么一根稻草，没想到谢富治根本不理睬这个离间计，照常当聂的后盾。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当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为副。聂一直不服，心中憋火，以后多次与谢有杯葛。谢越让着，她越得寸进尺，登鼻子上脸。

陈醒迈为首的“0363北京公社”战斗队在大饭厅入口处三饭厅东墙贴出了长篇大字报，“论我们与聂元梓的分歧与发展”，那是一块最好的大字报宝地，去两个食堂吃饭的人都能看得到，相当于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每天都会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为争那块宝地，还打过架，必须半夜三更去占领，还要写上“保留 X 日，请勿覆盖”之类。抄大字报的是戴定国，他们战斗队的笔杆子，后来进了井冈山兵团广播台，许多反聂檄文出自他手。他字写得漂亮，那天别出心裁，在署名“0363北京公社”时，故意把0写得特别大，还用成红色。0363是我们化学系三年级的代号。后来他们又有几份重型文章，贴在此处，署名照此办理。0363另外两支战斗队跟着学，署名时把0写大。后来，扩大到0打头的其他系，甚至不是0打头的系，为了表示观点，在署名战斗队前也画一个0。于是，大字报里0字满天飞，成了特色，我们这一派被称为0派。无产者一无所有从零做起，领袖批示文件划0照办，有等等说头。有一种有机玻璃的毛像章，头像旁边是一小段语录，我们改装，把语录换成0字。新北大公社则说我们是大零蛋，前途是零。

0派通过串连会的方式滚雪球，势力不断壮大，在各个系都有了分支，学名“北

京公社”，6月8日正式成立全校组织，领头人是陈醒迈，郭罗基加盟。

差不多前后脚，北大还成立了四个反聂组织。5月17日生物系樊立勤为首，在北农大成立“东方红公社”。5月22日，法律系二年级学生牛辉林为首，组成“红旗飘兵团”。6月4日，哲学系胡纯和地球物理系王桂琴为首，重新恢复“井冈山公社”。他们简称“红”、“飘”、“井”，人数都不多，观点也比较激进，有的有反对中央文革的“污点”或嫌疑，我们起初不与他们为伍。

从新北大公社又分裂出了一支反聂组织，称“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团”，简称团派，以物理系谢纪康、历史系靳讽毅为首，观点更为温和，6月7日成立。

五路大军，0派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其次是团派。他们都比较温和，反聂不倒聂，对孙蓬一往死里打。一开始很多反聂的人都与“井、红、飘”划清界限，比如1967年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批判校文革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0派团派，不提井、红。

经过艰难漫长的内幕谈判，这五个组这终于同意大联合。8月17日，毛题词“新北大”一周年之际，在东操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那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操场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就像盛大的节日。我们弹冠相庆，拱手同喜，每个人都戴上了“井冈山兵团”的红袖标。主席台上坐着兵团的头头，中间是满头白发的“寨主”周培源，叫总勤务员，众望所归。勤务员包括革命干部教师代表孔繁、杨克明，校文革造反派侯汉清、徐运朴，团派代表谢纪康、靳讽毅，0派代表陈醒迈，飘派代表牛辉林，井派代表胡纯和。地院东方红、北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四十几个兄弟组织前来助威祝贺，连聂元梓的好友蒯大富都发来了贺信。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赞歌》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成立宣言说：“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我们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后，我们要大造聂元梓孙蓬一的反。”反聂、孙，是我们的总纲领。

有了组织，我们不再形单影只，我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会场上到处找老朋友和新朋友。我惊奇地发现，过去的熟人朋友，比如南开中学的高中同学，包括高一届低一届的，去天津串联的那伙人，基本都是井冈山的。“河深海深不如同派的感情深”，“同一战壕的战友”，能找到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有

家的温暖,有舍命陪君子的支持,有两肋插刀的保护。有些人即便对运动不积极,也要参加一派。也许最早的决定处于一念之差,但是一旦“上了贼船”,就得生死与共。

此时是井冈山兵团鼎盛时期,拥有成员五千余人,包括有名的教授东语系季羨林,历史系周一良,地理系侯仁之,等等。那时北大教职工有4700人,学生8300人。季后来在《牛棚杂记》中写道,“我一生做的满意的事不多,拼着命反‘老佛爷’就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

“老佛爷”是聂元梓的外号,连毛都知道。“新北大公社”被叫做“佛兵佛将”。放过一个电影《清宫秘史》,奴才们见慈禧就下跪喊“喳”,我们又叫新北大公社“喳”派。这些外号不解气,叫聂“破鞋”,因为她文革时四十五岁,离过两次婚,当时的观念,“作风”不好。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原哈尔滨副市长,有了外遇,甩了她,38岁有三个孩子的她被迫离异。第二任丈夫吴慨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监委常委,大她二十多岁,与安子文关系密切,文革一来,倒台了。在康生的逼迫下,聂与之解除婚约。对这些人生不幸,我们不但无同情之心,还往伤口撒盐,甚至游行时用棍子顶着破鞋,以人格侮辱为快。聂元梓对这个外号耿耿于怀,在毛接见时还两次告“御状”。

新北大公社反唇相讥,叫周培源“周白毛”。的确,聂阿姨在学生里当头头,已经是北大一景了,又出来一个65岁的白发老人爷爷辈的当孩子王,老来聊发少年狂,一起摸爬滚打,更是一大奇观。这两位北大社教时反陆平的战友,现在成了死对头。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上面都保。但是,周老觉得树大招风,不久把位置让给牛辉林,只当勤务员。而牛辉林背着“红旗飘里有坏人”(江青的话)的包袱,不几日也自动逊位,由为人忠厚观点温和的侯汉清掌舵。

井冈山系一级叫纵队,对应的新北大公社系一级叫战斗团。纵队是军级编制,管好几个团呢。化学系03纵,纵队长是二班的齐菊生,和有些孤傲的陈醒迈不同,比较随和,身先士卒,但观点激进。陈醒迈被称为“陈老机”,老牌机会主义也。还有一个人,赵凯元,来自宣化,贫农后代,我不知道他的职务,也许是政委,观点更右,人称“赵老机”。什么事都要插一杠子,总部也去掺和,不听就跟你没完。我跟他比较合得来,许多看法也相近。

我们有一支很棒的文艺宣传队,叫“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名字太长，简称“万岁纵”，它的前身是0派为主的部分学生会管弦乐队队员，能演整本的《长征组歌》，非常之专业。五派联合后，人才济济，阵容豪华，有合唱队，乐队，舞蹈队，灯光组，后勤组，排练了北京音乐学院创作的《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国庆节在大饭厅首演就获得巨大成功。此保留剧目多次巡回演出，甚至去了天津，成为井冈山的金招牌。而后，他们又创作了大型歌舞《红太阳照亮全世界》，为老毛顺利度过73岁进入74诞辰祝寿，同样掀起一次狂潮。对应的是新北大公社“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斗团，简称“胜利团”，也了不得，有一个歌舞剧《抗大的道路》，可惜我没看过。

井冈山有一个摄影组，基本由化学系组成，组长是教员郭海。有一段时间为了应付上面“复课闹革命”，他给我们开摄影课。主要负责拍照的，是我们班的张大江，我和他们一起洗过几次照片，挺熟。几十年后，问张是否还有当年的照片，他说全在郭海那里。这些珍贵的资料恐怕永远石沉大海了。另外，井冈山还有一个动态组，组长是化四的黄XX，专门收集对方的活动安排，高层会议，人员变动，头头档案，外单位的运动动态，和上层的讲话指示，我们班的何国正是其中一员。他的观点更左，因林彪在井冈山时当过28团团长，他就以“115师28团”单枪匹马为战斗队，独自发表大字报。

六、投身派战

从来都是共产党自己解决党内的事，也解决党外的事。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彻底颠覆了这个历史，由非党的群众组织充当主体和动力，解决党内斗争。毛发明了一个理论，资产阶级在党内，主要敌人在党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还发明了一个新的革命方式：发动小鬼打大鬼，地方造中央的反，党外造党内的反。差不多是乌合之众的群众组织，破坏能力有余建设本事不足，制造动荡在行，维护稳定无能，充当打手。他们在做大之后，开始要摆脱束缚，对毛从偏离到分离，再到背离，进入旷日持久的全国范围的内讧内斗。

毛1967年秋视察华北中南华东，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有点打肿脸充胖子。武汉7.20事件就给他很大刺激，尝到了他难以驾驭的大动乱的滋味。

全民内耗大打派仗的滔天巨浪中，北大是一朵不小的浪花。派仗重新调动了

我们的积极性。校园里一度冷清的大字报栏再次红火起来，保聂反聂，泾渭分明。只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是共同的游戏规则。北大文革的重头戏，全在派仗里。

本来，井冈山的人只要求一个批评聂元梓的权利，而聂坚决不给，说反对合法的校文革，就是扭转文化革命大方向。矛盾逐步升级，整成两大派，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两派都说自己坚持了毛的革命路线，都说服从同一个最高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可是从来没有一次坐下来谈判协商，没有在一个问题互相妥协退让，取得共识，把它比作西方两党之争，并不合适。

井冈山的口号简单明确：反聂反孙。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胜算的任务。聂元梓打不倒，校文革推不翻，注定井冈山悲剧的结局。井冈山也确实不提“打倒”，用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没有的。”除了空洞的“反”、作对，拿不出具体的目标，明了的要求，比如要聂下个“罪己诏”，对什么人做平反，校文革作如何的改革。聂元梓最后是倒了，这也出乎绝大多数井冈山人的预料。比起最后给聂判刑的那些罪状，当年我们反的，只是皮毛。罪行之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古人云，十恶不赦，谋反居首。我们再上纲，也远没有这个高度。遗憾的是，井冈山以反聂为使命，竟没有写就一篇系统的、综合性的聂罪状的文章。

许多派战关乎到权力之争，北大却不是。清华414也是“在野党”，就把进入革委会筹委会作主要目标，他们还是联合对象，只是在多少席位，由谁进入上谈不拢。毛后来还提出过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井冈山则从上到下根本不稀罕留校当官。不用说改朝换代，取而代之，在校文革的权力中分一杯羹都没想，它的头头还主动退出了这个权力机构。这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执政观念的乌合之众，早晚得毕业，拍拍屁股走人。有这样的“高风亮节”，只能在野受压，被边缘化。

井冈山反聂，也为权，是生存权，自我防卫，自我保护。成立大会是它的最高峰，以后就被动挨打，双方力量悬殊。校文革财大气粗，公私通吃，有恃无恐。新北大公社无所不用其极，要吃掉井冈山，灭不掉也要秋后算账。井冈山的存在，是保护伞，主心骨，把反聂的力量拧在一起，人多势众，互相依靠；如果打垮打散了，个个都是反革命。

井冈山起家，靠的是文革初“凡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都必须反对”那一套，但从毛革命路线角度看，它用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对象。那根本不是毛文革思想的核心，只是打倒刘邓的敲门砖，时过境迁，过期作废了。井冈山的“理论基础”，是落伍的，过时的。

聂元梓则用“坚持大方向”反制井冈山，按照当时文革的套路，比井冈山站得高。

当然，跳出文革，哪个“大方向”，都是作恶，无非就是斗老干部。聂利用手中资源和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意押来黑帮现场批判，动不动就是万人大会，派新北大公社参加各个专案组，搜罗老干部材料。她是身在祸中不知祸，自以为得意的每一件事，都只是增加了自己的罪过。唯一好事，就是把井冈山排除在“大方向”之外，不许“革命”。井冈山除了反聂，干不成太大的坏事。

井冈山只反对聂元梓个人，不沾制度根源，不作理论分析，更不敢谈后台黑手了。有人说什么民主斗士，太拔高了，自我贴金，顶多算“不畏强暴”。那时人的思想，完全在毛的文革框架内，不可能超越。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口号，我们与之风牛马不相及。普世价值，人权，从没听说过。所谓民主，一般人理解无非是当领导的听听群众意见，作风开明，要求再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了；井冈山人的思想，没跳出这个圈子。文革的本质是反民主，反科学，井冈山和公社都是干将，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我们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新北大公社用“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回应。他们则津津有味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我们则报之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打语录仗，玩政治游戏，耍嘴皮子。我们骂聂元梓破鞋婊子，新北大公社骂我们“牛头山”，国民党残渣余孽，大杂烩，右派翻天。实际是，春秋无义战。一边说，你压制了我；另一边说，你本来就应该服从我。就这么点事，都要整死对方，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政治无道德”。“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自欺欺人的假话。多少恶行都假革命的名义，彼此彼此，不分仲伯。

我们化三男生，自行调配了宿舍，按派住。对立的同学不相往来，大字报上见，很多人一年多以后“大联合”时才久别重逢。我原本在“03红旗”中有些朋友，也不共戴天了。派战时我们情绪随着交战形势而变，兴奋，骚动，压抑，惶

恐。经常没什么事可做，游手好闲。无所用心，蹉跎人生，百无聊赖。很多人玩起了自装晶体管收音机。我是拿过几本大部头马列著作，下了决心，就是钻不进去。还是自学英语吧。以前是学俄语的，肯定没用了，就拿着英文版的《语录》和《九评》死啃。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本《速记教材》，边学边练，还真会了。

我们三天两头到庶务科拎大捆纸大桶浆糊，大字报慢慢变成诋毁谩骂，恶意中伤，充满语言暴力。虽然是白纸黑字，也不用管文责自负，而且经常在大清早贴出去，趁无人之际，专门盖对方大字报。后来懒得写了，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刷标语。中央文革成员林杰私下有政治斗争三箴言：“要结成死党，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它上不了台面，却是入木三分，大家都这么干。

校园呆腻了，我们凑了七十几人，步行游周口店云水洞妙峰山，一路上地质地理系的同学做地形地貌的科普。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辩论几句就开打，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屁滚尿流，当时那个解气啊。

校文革掌握着经济财政大权，派人看我们的档案，到我们老家调查。如果井冈山的人去办事，经常被刁难。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抢大印行动。校文革办公室坐落在一院，庭院式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环境优雅。我们一行四人，我在外面放哨，化四两个壮汉进去假装办事，见到办事员拿出大印就一把夺过来，交给接应的华南平，他跑得快，我们掩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得心都跳出来了，大功告成！井冈山广播台立即传出喜讯，而新北大公社气急败坏地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和新北大公社的组织严密、层层服从相比，井冈山像个杂牌军。它的参加者，多数属于“草根”，平头百姓，“被逼”上山的，“被弃”上山的，“被带”上山的，散沙一盘，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进出自由，不用注册，不少人就是挂个虚名，散兵游勇，典型的松散群众组织。成员自由散漫，我行我素，都有点特立独行，不服管束的“造反派脾气”。我们“115师”二十六七个人从成立后就没能开过一次全体会，没有一次统一的集体行动。就是我自己，也以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榜样，刻意地追求“痞子”做派，吊儿郎当，不修边幅，油嘴贫舌，哥们义气。好的是没有人来这里为了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所以没有野心家，没有争权夺势。侯汉清靠他的好人缘，谦谦君子作风，而不是铁腕，还

勉强拢得住。

广播台是两派激战的喉舌。晚饭过后，夕阳西下，“新北大广播台”的声音开始响彻校园。一阵狂轰滥炸。它的前身是学校广播台，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网络遍布燕园。它的声音刚落，浑厚低沉带着悲壮的“井冈山广播台”主题歌《西江月：井冈山》缓慢升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广播台位于28楼总部所在地，高音喇叭和新北大公社的混合架设。接着就是我们男女两位广播员激昂嘹亮的声音，字字句句沁人肺腑，男主播傅成励后来是中央广播台著名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女主持人毛福持插队时到了阜城，曾和我一个公社。

台里有一批写作快手，经常是公社刚刚播发稿子，马上针锋相对，反驳文章出来了，予以回击，后发制人。两边的广播，声音远至颐和园，五道口，方圆几十里。为此双方经常展开破坏对方喇叭的大战，或偷偷摸摸，或大打出手。我们班的杨惟立是这方面干将，别看他180多斤的体重，爬电线杆子灵活极了。

井冈山在上面也是地位卑微，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视它为合法权力机构下的捣蛋者，没有人接见过它的头头，等于不给“革命组织”的名分。谢富治还绝，每发话，都通过聂元梓，提醒说她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聂元梓每每炫耀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殊关系，与中央文革的亲情，以嫡系自居时，井冈山能够得上的最高层人物，只有号称“副省级”的首都红卫兵核心组副组长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真正的铁哥们。因为与上层没有瓜葛，井冈山倒留下了较为清白的名声，没有沦为打手或工具。

除了身居简出只保驾护航的林彪，几乎每个中央首长都对井冈山有批评，有警告。江青说“红旗飘有坏人”，“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井冈山“背后有黑后台，外国特务”。周恩来通过谢富治传话，强令周培源“下山”。陈伯达说对聂元梓“要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连最高指示都有“井冈山里坏人多一些，聂元梓这一派好人多一些”。那个年头，这些指示，哪一条较起真来，都能压死人。由于在夹缝中生存，在钢丝上行走，井冈山的头头们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容易。在政治上小心翼翼，不惹是生非。一般组织的头头都是群众中的激进者，偏激者，井冈山相反，它的总部是比较保守，比较温和，比较右的。

当然井冈山逮着机会的时候，也会狠咬聂元梓一口。这位老太太，有点反骨，麻烦制造者，有时让上面头疼，偶尔会传出批评的声音，比如陈伯达一次搭错了筋，说聂“执行了资反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我们则会抓住这类一言片语，做足文章。那个时候，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祸福之差，全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恶。中央文革没有一棍子把井冈山打死，说不定也有制衡聂元梓的想法。

由于把在逆境中生存放在第一位，井冈山在干部问题上过于保守，缺乏勇气，不够义气。在反聂初期，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也到老干部老教授那里招兵买马。我和华南平就去化学系教授唐有祺家当说客，只是软钉子，无功而返。七月初，一百多名干部联名写大字报，支持0、团、飘，送来了橄榄枝，但是井冈山后来自顾不暇，没有能大量吸收老干部。在聂元梓的校文革加紧迫害他们时，井冈山没有旗帜鲜明站出来支持、保护他们，这一点绝对不如清华老四。到后来，孔繁、郭罗基等旗帜性的人物也都退出了领导核心，井冈山成了纯粹的学生组织。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说，1967年时，她曾经想激流勇退，辞去职务，但江青不允许，所以欲罢不能，只好一条道走到黑。我相信这是她的某一时间的真实思想。蒯大富也说过骑虎难下这类的话。毛把全国人民绑在他的战车上，没有一个人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想跟的人不知怎么跟，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知国家前途在哪，关心个人命运的人更是看不到出路。我当时虽然热衷于派仗，思想常常在亢奋之中，其实是靠这个麻醉自己，什么都不敢细想，只有听天由命一条。所谓形势逼人，无路可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资料】

文革书简

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

(1966年8月26日——12月21日)

俞小平

第五封信：致父母（1966年8月26日）

爸爸、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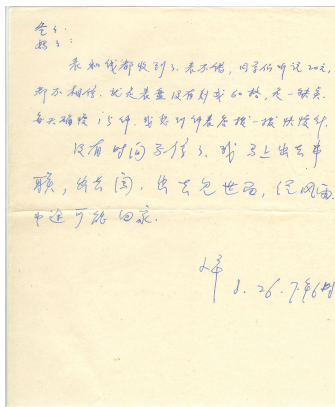
表和钱都收到了。表不错，同学们听说20元都不相信。就是表盘没有刻成60格，是一缺点。每天确慢一分钟。我想我要到钟表店拨一拨快慢针。

没有时间写信了。我马上要出去串联，出去闯，出去见世面，经风雨。中途可能回家。

小平 8月26日下午6时

说明：

这封短信说了两件事：收到家里寄来的手表（只有五钻，因此很便宜）；出



门串联。“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暴力破四旧。我和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反对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和破坏文物，在海淀镇与红卫兵发生了几起冲突。有人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我们反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这个罪名我们担当不起。正好大串联刚刚兴起，我于8月26日晚与几个同学去北京站乘火车去外地，一为串联，二为避祸。9月23日回到学校。

第六封信：致父母（1966年10月2日）

爸爸、妈妈：

我于23日午夜到达学校。这几天学校里很忙，又要斗陆平，又要准备国庆节活动。我被分配搞接待外宾的工作，国庆节前后要来不少外宾。现在红卫兵比较忙，而其他同学清闲得多。我感到总是有点关门主义。

关于军服，可没什么办法。这恐怕必须通过关系才能搞到，否则北京几十万红卫兵，再加上外地的，哪来这么多。听有人说要发军服，不知是否确实。我接电话后当天下午就去找小靖了，她住在高等军事学院，没去找汪阿姨。我给小靖20斤全国粮票^①，10元钱。她的鞋快坏了，让她买了一双鞋。30日她又来找了我一次，因为她2号就走了。

因有迎宾任务^②，我未参加游行，看了电视，游行到下午3点半才结束。国庆节后要下乡参加秋收一星期，但我有迎宾任务，可能去不了。

比较可靠的消息，我们系11月底可能搬家，去汉中建立分校。那边基建工程已经结束了。走以前将会有一次大辩论，要作审查，不合格的转入其它系学习。现在我们的班级，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这出身复杂的班级，就是不容易弄好。其它情况，以后再谈。

小平 10月2日

说明：

① 当时吃饭必须付粮票，出门到外地去要带全国粮票。

② 那时我是校学生会军乐队小鼓手，每逢外宾来访，我们以军乐队参加欢

迎。

第七封信：致父母（1966年10月24日）

爸爸、妈妈：

10月3日。征平^①到我这里来了。他说他们是来告状的，并说周总理已同意接见他们。我看他穿着军服，就告诉他小靖要军服，征平答应给她一件。

自从10月6日有人贴了一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掀起了一场大辩论。开始主要是辩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是什么样的路线，以后逐渐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则是向李雪峰开火。

辩论中有一个致命问题，使辩论进行不下去，并使大部分人外出串联，这就是阶级路线问题。过去一段时间中，我校红卫兵所执行的阶级路线是有很多唯成分论的，动不动骂人狗崽子。这样从8月下旬，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敢发言了，因为他们不是红五类出身。若敢说红卫兵一个不是，就要被围攻，即红卫兵批评不得的。持这样意见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以我年级为例，多半是些“多朝元老”。他们都是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当有不合当时形势的新生事物出现时，他们就压制，即使是无疑正确的，他们也压制。还在8月下旬，我们就吃过这个亏^②。那时我们因中学红卫兵的某些错误做法进行了干涉。我们做对了，他们硬说我们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批评的对象是红卫兵。我们认为他们实行的是形“左”实右的反动的阶级路线，这样的阶级路线肯定是要使红卫兵脱离群众的。有意见的人很多，但是不敢讲。关于阶级路线问题，最近辩论了一下，但大字报不多。因为相当多的人还不敢讲话，所以阶级路线问题是发动群众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发动不起来，其它问题都是解决不好的。但现在走的人太多，无法辩论，只有等他们回来再说了，那时我们要打（大）造其反。现在班级文革领导小组已解散，组织了战斗团、队、组。

我觉得，触及灵魂的东西绝不是用粗暴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落后的分子，绝大多数需要加强教育，而不是大棒。关于红卫兵的某些错误，中央负责同志屡次讲话中谈及，当然不能批评得太厉害。而有些同志就不以为意，照样干自己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大靖的“红铁兵”有红外围组织，很好；小靖的“红卫兵”没有，这就不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中央负责同志

屡次批评过、改过，不应该再抓住不放了。

不知大靖、小靖、小四③对此是什么意见，愿意跟她们商讨。

小四来北京，还没来找我。

其他一切都好，请勿挂念。

小平 10月24日

说明：

① 征平是我的表弟。那时他是大连中学红卫兵一派的头头。

② 指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开始时我们与红卫兵的冲突。

③ 小四是我的三妹，当时是南京市的初中生。

第八封信：致父母（1966年10月31日）

爸爸、妈妈：

10月23日信收到。35元已收到，上次信上已写了。

原说11月可能走，是当时情况，并且现在的确有几个班在三线了。但按照目前形势来看，今年大概都不可能走了。到底什么时候走，完全无法确定。现在我校的情况是：出去串联已走百分之九十，留校的现在不知有一千没有，而且还有人准备走。因为人走光了，运动停顿，留着没多少事可做。其他学校也基本如此。这样外地师生来了，能交流的东西很少。听说其他城市也是这样。结果弄得大家都去做客，但都很难找到主人。好处呢？大概是可以周游全国、游山玩水了。最近又要搞徒步远征，这样到底很有好处，可时间太长了。现在也不是时候。反正现在黑帮可轻松了。目前我不打算出去了。

小四既赶上了18日的接见①，就应该赶快回去，现在北京天气越来越冷了。小四没来，我也没找她（汽车很难乘，太挤），可是大靖27日来找我了，她来要棉衣穿。我打算把不用的东西让大靖带回去。最近几天可能组织毛主席接见。小靖最好不要来了，天冷，外地师生病的不少。哈尔滨当然更不行，过几天那里就是冰天雪地了。

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11月10日前停止北京师生外出，准

备长征的人暂停出去。中央正在调查有关事项并作出决定。

现在我们事情不多，有时印些传单，写些大字报，或者到外校串联。

小平 10月31日

说明：

①毛泽东发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从1966年8月到11月，八次分十批共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约1200万人，以此激发青年学生参加文革运动整他的政敌。当时全国大部分大、中学生都到北京参加了接见，我的妹妹们也不例外。

第九封信：致父母（1966年12月21日）

妈妈：

我已于昨天早晨安抵北京①，路上很好，火车也不挤。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数都回来了，现在就是事情不多。

北京现在形势不错。最近抓了一批东、西城纠察队②及第一司令部③打人、杀人的凶手。在北京第三司令部倒是比较好的，他们并未参与冲中南海、国防部等活动，也很少打人。但是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外地就胡闹，一听见造反派就支持。我们班去南方的同学，一点也不支持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④，也不支持那里的造反派。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和上海之行使他（她）的威信大大降低了。

校内现在正在批判一些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保聂派抓起了两个有反动言论的学生，送到公安局去了，但今天又拉回来斗争，并且搞武斗，不低头就打，说他们是反革命。实际上违反了十六条。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小靖他们的长征队走了吗⑤？

小平 12月21日

说明：

① 我于11月上旬到12月中旬在南京家中。

②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和东城分队（简称“东纠”），其成员大都是干部子弟，行为极左暴力。

③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各级党委和老干部。由于中央文革不予支持，逐渐让位于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

④ 聂元梓于1966年11月奉中央文革之命去上海炮打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她在上海写的大字报被称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⑤ 我的四个妹妹和一共十几个11至17岁的孩子，从南京步行长征去扬州方巷大队串联。方巷大队是当时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四清试点，当时很有名。

（张从提供）

【资料】

北京大学1967年大事记

1月

1月1日 《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这期间他们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委员杨勋等人，押送公安部。

1月4日 校文革联合49个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

资派”，“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

1月5—8日 校文革联合“北航红旗”等21个院校的造反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

1月8日 解放军第63军和装甲兵一千多人组成的军训团进入北大，开始军政训练。1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要求向解放军学习突出政治、突出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在北大、清华、北航搞军政训练试点。

1月10日 《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同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

1月16日 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1月17日 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

1月18日 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各部门的大印。

1月20日 《新北大》刊登聂元梓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并刊登攻击贺龙的文章,说要“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

龙”。

1月22日 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她说：“我们对你(蒯)，自己的战友，希望你成长得更快。可是你对北大的‘虎山行’、‘红联军’、‘井冈山’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在此期间，北京市的造反派在“一月夺权”中，开始分裂成两大派：“天派”和“地派”）。

1月23日 《新北大》发表攻击朱德的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

1月24—26日 高教部“延安公社”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大批人到北大校内示威游行、刷标语，反对聂元梓。“北大红旗兵团”则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1月27日 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还通过、发表了《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倡议书》，提出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

1月28日 1月25日和当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

2月

2月1日 支持聂元梓校文革掌权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组成了“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

▲《新北大》刊登《彻底清算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说：“‘虎山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小集团”，“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是有反动社会基础的”。

2月3日 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

委员长。

2月10日 《新北大》以全部版面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之一》。

2月14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2月10日发出的《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改组后的常委会名单为：主任聂元梓，副主任：白晨曦、姜同光（新升）、徐运朴、裘学耕（新升）、王海忱（新升）、杨学祺；常委：孙蓬一、王茂湘、段心济、刘国政、戴新民、侯汉清、冯迎玺、陈影、唐景春。

2月15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最热烈祝贺。“公社”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卢平、刘冲、孙月才、李长啸等。“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

2月16日 “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造反团”联合编写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阴谋》一文在今日出版的《新北大》刊出，同时印刷50万份向全国散发。

2月18日 63军军训团撤离北大。这期军训共进行了一个多月。《新北大》刊登《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的文章，说：“杨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2月20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批判“刘、邓罪行”大会。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2月23日 《新北大》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调查报告之二：《评刘少奇1961年湖南之行》。这个联合调查团是由北大、北师大、北航等几个红卫兵组织组成的。

2月25日 《新北大》以全部版面刊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

3月

3月1日 校文革召开部分“犯错误”干部座谈会,要“犯错误”干部站出来亮相,“起来革命”。

3月3日 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聂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校行政工作委员会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

3月11日 《新北大》发表题为《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的社论。社论说,“校文革决定开门整风”,“在整风过程中,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搅乱我们的阵线”。

3月14日 《新北大》发表《向“温”字开炮》的社论,说:“‘温’是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弱点”,“危险的敌人”。“温就是软,对革命的敌人不狠”,“非把‘温’字整掉不可”。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3月18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

▲中文系1962级学生沈达力,曾参加“红联军战斗队”,批判过聂元梓。江青为保聂元梓,诬“红联军”是“反革命组织”,聂等即揪斗、围攻“红联军”成员。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大帽子进行批斗。沈服毒并投水而亡,时年22岁。

3月21日 “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队”等20个组织成立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发表了《公告》。

3月25日 《新北大》发表“中国作协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合写的《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的文章。

3月27日 陈伯达、戚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对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陈还说:“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并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

▲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北大原副校长周培源,原党委常委、教务长、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崔雄崑在大会上亮相,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月 孙蓬一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物理、数学、无线电系的部分学生成立“揪叛徒”专门班子,定名为“揪叛徒联络站”(后改组为兵团)。

4月

4月1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举行成立大会。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召开“彻底批倒、批臭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发言,说要“掀起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新高潮”,“一定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珮云、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

4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校行政工作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白晨曦宣布:行政工作委员会在校文革领导下负责全面工作。由周培源、白晨曦、崔雄崑等组成。行政委员会主任周培源,副主任:白晨曦、王茂湘、段心济。机构有:①教改组组长王茂湘,②教务组组长崔雄崑,③人事组组长任利泰、余真,④后勤组组长田加林。并宣布行政委员会公章当日启用。

4月11—12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

4月12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地派)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

必夺，寸土必争。”并指责对方(地派)是“真正的摘桃派”。

▲校文革和外校18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珮云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晚，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到北大，通过广播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11日夜间和12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自己的学校”。

4月14日 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力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选定的成员均送“康办”备案（该兵团后来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在“百人专案”中，将叶剑英按照中央决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的三百多名我党干部，全说成是叛徒；搞北京地下党一案，诬陷刘仁。他们搜集编造彭真的材料，为康生陷害彭真提供了“依据”）。该战斗队人员逐步达到125人。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

▲聂元梓于20日前后，授意“第二战斗队”队长杨建铎派人调查胡仁奎等人的“特务”问题，借以诬陷彭真。随后，专案组长写出了《关于胡仁奎、李伦和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关系的调查报告》，经聂元梓、孙蓬一上报康生。康批转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

4月24日 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珮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4月25日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来校参观。

5月

5月5日 中文系造反派批判影片《青春之歌》，说它是“黑《修养》的艺术标本”，是“一株大毒草”。

5月12日 《新北大》和《文学战报》联合出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特刊，发表了“新北大文艺批判战斗团”和“作协造反团”一起编写的近五万字的《1949—1966 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5月16日 校文革召开批斗翦伯赞大会。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周扬、吴晗、廖沫沙等被揪上台陪斗。

▲“五一六公社”成立，发表宣言称：要批判聂元梓、孙蓬一反动路线，为“井”、“红”翻案。

5月17日 孙蓬一写信向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的组建结果及工作进展情况，请示如何上送材料。康在信上批示：“可直接送。”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五一六公社”加入），樊立勤为发起人。

5月22日 “红旗飘”成立，发表反聂元梓校文革宣言。该组织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本年2月份即开始活动，其核心组成员有牛辉林等五人。

5月31日 校文革常委会决定6月1日为校庆日。

5月 聂元梓派高云鹏去汉中653分校，以驻汉中分校宣传队负责人身份负责分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成立校斗、批、改委员会。崔雄崑任主任，杨学琪任副主任，主要成员有刘国政等人。

6月

6月1日 校文革举办“庆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大会。有各地七百多个单位的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布《校文革关于正式通过“六一”为新北大校庆纪念日的决定》。会上，揪斗了陆平、彭珮云。

▲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在办公楼前落成。

6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问题的决定》，规

定1966年毕业生、1965年待分配毕业生应立即进行分配。1967年毕业生原则上应在本年七八月进行分配。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出《通告》：“决定召回所有在外地（包括本市各单位）的北大师生”，要求“赴各地和本市各单位的调查组、校刊办事处和在外地的记者”，“务必在本月15日返回学校”。《通告》说，“从本月15日起，他们在外的一切活动与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无关。”（这则《通告》实际并未执行。）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简称联战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9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6月10日《新北大》发表《在战斗中整风》的社论。社论说：“在最近一段工作中，校文革的领导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甚至在某些方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开展严肃的整风运动刻不容缓。

6月13日“新北大福州联络站”自本月7日开始至13日参与反军（福建军区）绝食活动。

6月14日《新北大》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必须批判》的文章。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裂”。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得、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6月中旬 “新北大公社铁锤兵团”、“新北大公社工人兵团”相继成立。

6月20日 高云鹏在汉中分校组织北大、西安交大在汉中的部分学生，以查抄黑材料为名，抢走汉中地区公安处1966年5月至年底的公文、会议记录等，造成失密。

6月22日 《新北大》发表《批评左派，必须爱护左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社论。社论批驳对立派提出的北大“要全面夺权”、进行“二次革命”、“整风解决不了新北大的问题”等反对聂和校文革的口号，并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6月28日 金××对聂元梓说：“关于抗缅问题，我国政府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们文艺界准备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暴行，戚本禹要我请你参加我们大会并讲话”。聂答应去，并表示要“红代会”的同志也去。接着戚本禹又找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戚本禹说，“我们的政府调子不高，总理作事总是愿意很稳重、谨慎的，未免有点太保守了。你们要到外交部找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所以一定要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要用群众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会后要分两路游行，一路要到缅甸大使馆，一路要到外交部，也让外交部领导（意指总理——聂元梓原注）看看群众的革命义愤，仅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够不够，和当前的革命形势相比怎么样？”聂元梓和北大红卫兵参加了大会。会后聂元梓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率领红卫兵到了外交部。

6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该组织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争（原文如此——编者注）队”队长赵建文称：“1967年春，从民族学院那里知道‘0007密令’问题后，怀疑总理

和这个问题有关系。聂元梓、孙蓬一把我们找去做了汇报，决定到湖南调查。”聂元梓说：“你们可以去，湖南是有这个密令，他们还来北京上告过，你们去了可以找一下‘湘江风雷’和‘高司’，也可以了解一下湖南军区的情况。聂还议论湖南军区是总理支持的。他们让去湖南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原文的引号就是这样用的——编者注）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副队长潘国华称：“5月上旬，赵建文对我讲：陈××（原无线电系学生）和孙蓬一联系，他在长沙调查了‘0007密令’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孙蓬一让我找陈把材料取回来整理上报。回来后，赵建文对我说：聂元梓、孙蓬一要赶紧把材料整理上报。赵建文还说：要赶紧把‘0007’案件材料整理上报，总理就是有错误，以后中央不保总理时，整理的材料就是反总理的材料。”

赵建文的说法是：“关于‘0007密令’的问题，是聂元梓、孙蓬一及他们的黑后台向中央进攻的炮弹。1967年6月5日以后，陈伯达的秘书到北大来，我向他做了汇报、送了材料。除了‘除隐患’自己送之外，姜同光告诉我聂元梓也给了陈伯达。”聂元梓说：“赵建文对我说：材料中涉及到总理，这些材料将来都是很有用的。可以从正反中发现问题。我给想了一个办法，这些材料，现在正反的都在一起混着，就这样摆着不要加以整理，也看不出来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记住，要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中可以分析，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整理出来。赵还说，‘他已经复印了学部的材料，里面有总理的……’。我说赵建文出了一个好主意，就这样办吧。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反王、关、戚的掩护下也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的指导思想和作法。‘除隐患’后期的工作，就是做的这些工作，只有赵建文是积极参与与制定这个指导思想并是具体执行的人。‘除隐患’后来整理的一、二、三批材料，是指向总理的。”

7月

7月1日《新北大》刊发批判胡乔木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

▲周培源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内称：

“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7月3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发出《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通告。

7月5日《新北大》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社论说：“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复课闹革命，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是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

7月7日“北京公社”、“革造总部”和“红旗飘”联合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动员大会。

7月10日陈伯达发表讲话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碰自己的脚。”

▲“红旗飘”、“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校文革的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

7月11日校文革召开师生员工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常委会提出“复课闹革命”十点意见，确定崔雄崑任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要“建立革命秩序，统一作息时间”。

7月12日“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编辑的《新北大报》创刊号出版，发表题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长文章和《欢呼〈新北大报〉的诞生——代发刊词》。

《代发刊词》批判《新北大》校刊，说它已堕落为扶植保守派、围剿革命派的驯服喉舌，堕落为孙蓬一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说“它鼓吹‘上揪下扫’、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全校“痛击刘少奇猖狂反扑大会”，聂元梓作动员报告，把刘少奇的检查称为“反攻倒算的宣言书”。会上发布“动员令”，动员群众积极投入“批判刘少奇的新高潮中”（13日，校文革邀请建工

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来校介绍他们“揪刘经验”）。

7月14日 校文革将胡耀邦、胡克实揪来北大批斗。

7月16日 《新北大》编辑部发表《严正声明》，内称：《新北大报》盗用毛主席的题字，是“分裂主义的报纸”，出版《新北大报》“是他们公开搞分裂的严重步骤”，是“把斗争矛头恶狠狠地指向新北大的红色政权”，“充分暴露了他们为‘夺权’，而制造舆论的可耻目的”。

7月18日 聂元梓召开“打倒刘少奇、揪斗邓小平、彭真誓师大会”。聂元梓的讲话、崔××及“新北大公社”等头头的发言对刘、邓、彭进行攻击。大会决定全校革命师生于19日进城游行，勒令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彭真到北大低头认罪。

7月19日 聂元梓等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先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开誓师大会，聂元梓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然后派“刺刀见红战斗队”等红卫兵队伍开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此后，聂元梓还多次去慰问北大学生，并代表红代会慰问其他高校学生、鼓动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7月20日 校文革组织集会，声援汉中地区造反派，表示要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7月22日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7月24日 晚，校文革再次组织批斗彭真的大会。

7月26日 《新北大报》发表《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校文革反动路线铁证如山，造反派从黑“二组”抄出大批黑材料》的长篇报道，说：校文革的二组是“镇压‘井’、‘红’的刽子手”，它“陷害造反派，罪责难逃”。

7月27日 “新北大公社”与“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联手，组成了“揪刘（少奇）斗争火线指挥部”。

▲《新北大报》和中国作协的《文学战报》联合刊发的《彻底粉碎刘、邓黑司令部的一个反革命复辟大阴谋——揭开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的黑幕》的文章。

7月28日 《新北大》刊登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的讲话。江青说：“我们

不能太天真烂漫。当一小撮人挑起武斗，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革命小将们，你们要吃亏的。”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全体会议，会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指示，要在8月5日揪出刘少奇。揪刘指挥部还提出了揪刘计划。蒯大富说：“兵分两路总可以揪出来，一路去找总理，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说：“我同意兵分两路”。聂元梓还传达了陈伯达、戚本禹在北大的讲话（即：“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7月31日“新北大北京公社风雷激”等39个战斗队贴出《关于团、0、飘、井、红实现革命大联合问题的联合声明》。

7月“新北大井冈山公社”、“红旗飘”、“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联合参加“首都批资联委会”。这五个组织在校内也联合成立大批判办公室。下设七个批判办公室。

▲本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新北大公社”外联组组长刘××到聂元梓家，刘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建工‘八一’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刘说：“这么说，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

▲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政府机构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8月

8月2日《新北大》发表《同志，且慢走》的评论员文章。文章针对师生

员工纷纷假托亲人有病等理由“离校返乡”的情况，要求“刹住回家风，参加大批判”。

8月3日 聂元梓召集“新北大公社”头头们开会，传达红代会的决定，说8月5日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一路去揪刘少奇，我们北大一定要两路都参加，要有面对面斗争的决心。会上决定北大再增派三百人到中南海“揪刘火线”。

8月5日 《新北大》刊发批判罗瑞卿的文章。

8月9日 《新北大》刊登批判、打倒彭德怀的文章。

8月12日 新北大“八一兵团”和石家庄“揪斗崔田民联络站”共二百余人冲进铁道兵司令部大院，抄家、抓人，并撬开保密文件柜，抢走1409份文件，造成严重失密。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此前，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聂元梓曾多次发表演说，说：“现在揪军队一小撮成为运动的大方向。”“运动要深入发展，就必须从揪地方上的走资派，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两派均向各地派出联络站，与当地造反组织联合，“揪军内一小撮”。

8月15日 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8月17日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和“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派组织（简称井、红、团、0、飘）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今天在“五四”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去完成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历史任务。”周培源、李醒尘出席大会并讲话。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部勤务员（核心组）有周培源、侯汉清、郭罗基、牛辉林、徐运朴等11人。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后改为牛辉林任组长）。“清

华大学井冈山”司令蒯大富等来信祝贺。“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8月19日 高云鹏在汉中653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当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

8月23日 《新北大》刊发批判萧华的文章。

8月26日 《新北大》发表编辑部抗议牛辉林等捣毁《新北大》110期铅版的文章和“井冈山兵团”绑架保卫组组长的文章。

8月29日 新北大“调查组”在东北四平市参加了抢武器库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打伤、打死57人。

8月31日 崔雄崑主持召开新北大干部串连会,发起召开揭发、批斗“陆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大会”。

9月

9月1日 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9月2日 校文革发出《通告》,要求“凡外出串连或无故回家的师生,必须返校闹革命。”

9月7日 《新北大报》编辑部发表《粉碎二月复辟逆流,恢复“井”、“红”本来面目》的文章和“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彻底为“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红旗赤卫队”、“红教联”翻案的严正声明》,批判校文革“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

9月16日 江青讲话说,“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新北大报》发表《热烈欢呼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原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彻底翻案的公告》。这份8月17日发出的《公告》说:“新北大井冈山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期还发表署名井同松的题为《谁敢否定我们的大方向》的文章。说:“聂、孙是镇压造反派的老手”,“去年镇压‘井’、‘红’,……今天老佛爷(指聂元梓)又做起镇压‘井冈山兵团’的黄粱美梦来了”。文章还批判聂元

梓、孙蓬一说：“你们残酷地打击一大片，数百人的劳改队迟迟不解散，剥夺数百名干部、教员的选举权”。

9月17日 解放军军训团少数留校人员全部撤离。

9月25日 校文革在“绝不允许右派翻天”的口号下，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伊敏等一大批干部。

9月30日 第二座毛主席塑像建成。它立于哲学楼、第一教学楼之间的广场上。

9月9月1日后，侯汉清任“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牛辉林改任副组长。

10月

10月4日 校文革召开全校“斗私批修”誓师大会。

10月5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揪斗戈华的严正声明》，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刻把戈华交出来”，斗倒、斗臭（戈华亮相，站在了井冈山一边。“新北大公社”多次声言，“戈华是井冈山的黑高参”）。

10月9日 “新北大公社”召开“批斗三反分子戈华大会”。

10月12日 《新北大》刊登《彻底粉碎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一文，指责对立派是老保。

10月19日 《新北大》刊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本月15日《决议》，内称：“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应遵照谢(富治)副总理指示，承认新北大校文革是新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欢迎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参加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但必须到校文革开介绍信，否则不适宜参加”。

10月22日 《新北大》发表题为《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说“这个原则就是承认校文革红色政权的领导”，说“一只反革命黑手”，“利用左派犯错误的机会”，“一手炮制了井冈山兵团”，破坏了北大的“革命大联合”。同期《新北大》还发表了《立即行动起来，开学闹革命》的社论。

10月23日 聂元梓主持召开斗、批、改委员会，决定成立若干个直属校文革的专案组，其中包括陆平、彭珮云、翦伯赞专案组等。抽调80多人搞专案

工作,并在44楼、第二体育馆、五斋、生物小楼、北招待所等处设立关押中层干部及师生的场所。

▲《新北大报》第17号发表“井冈山兵团”《关于彻底改组校文革,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严正声明》。其中说:“目前存在的北大校文革只能代表我校两大派中一派的意见,(它)实际上是一个派文革。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必须立即彻底改组校文革。”同期,还发表本报评论员的题为《彻底改组校文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文章,说:“现存校文革”是“由聂元梓一手操纵的,拉拢亲信,排斥异己,几经清洗修补完成了的,由聂、孙地下常委控制的独立王国”,“完全是和新北大公社两位一体的派文革”,它“早已把自己降为宗派小集团和纯粹的派文革”,“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25日 校文革决定当天正式“开学闹革命”,由聂元梓、崔雄崑、王茂湘等人组成开学闹革命领导小组。

▲校文革举行复课闹革命开学典礼。典礼上强调,“复课闹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是,必须“从根本上砸烂旧教育制度”,“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

10月29日 《新北大》报道:校文革教改组主办的《教学批判》于1968年1月创刊。

11月

11月8日 伙食处员工食堂管理员刘长顺,中共党员。“文革”初期受到多次批斗,强迫劳改。他本有肝病,身心受到折磨,病情加重得不到治疗,直至腹内积水病情严重,才送医院。不久即去世,时年50岁。

11月9日 《新北大》发表《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的社论。社论说:“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俱全的黑店”。复课闹革命“存在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上业务课就是复旧”、“要以闹革命为中心,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11月18日 “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批判、揭发聂元梓、孙蓬一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3日 北京市革委会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转发市革委会值班

常委《关于北京大学 1966 年毕业分配领导小组问题》的指示：“中央和市革委会认为，新北大校文革是权力机构，同意新北大在校文革领导下，吸收井冈山（兵团）及未参加组织的同志参加各级分配小组”。

11月25日 《新北大》刊登《关于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文革教改组教学改革座谈纪要》。

11月28日 “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支持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同志杀上革命第一线大会”。孔、杨在会上表态说：“井冈山兵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兵团核心组组长侯汉清在会上宣布，接受孔、杨为兵团战士，并吸收到总部工作。

11月29日 《新北大》发表《不当逍遥派，不当半截革命派，应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派》的社论。

11月30日 《新北大》报道：30日全校举行党员大会，由聂元梓宣布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的建立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报道说，11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吴德指示聂元梓，可以立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由谢富治、吴德审批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名单，其中：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崑。《新北大报》发表《解决干部问题，促进教育革命》的社论和《彻底解放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的文章。社论和文章提出：“必须彻底批判聂、孙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清算聂、孙迫害革命左派的罪行”。

12月

12月3日 “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从南口将戈华抓回北大。

12月6日 《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就是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的文章。

12月7日 《新北大报》刊登哲学系62级部分党员12月1日写的《不许聂、孙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严正声明》，对聂元梓“不经党员酝酿、讨论”突然成立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抗议”声明说：聂元梓们实行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把一些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人塞进‘领导小组’”。“呼吁一切革命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抵制”。

12月9日 文科各系40多人组成文科抗大试验班，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

参加劳动,开展社会调查,学习讨论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摸索文科教育革命的道路。

▲《新北大》发表本刊记者写的:《孔(繁)杨(克明)上山后井冈山兵团的新动向》一文。同日,校文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会上揪斗“新北大井冈山兵团”06教工支队成员。

12月14日 《新北大》发表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孔、杨、牛、侯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是“走资派、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同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通告》称:“你们胆敢把武斗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自卫性还击”。

12月15日 校文革常委会、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新北大公社”总部联合发出《关于立即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决定》。

12月20日 《新北大》发表《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的文章。说,其“要害是充当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企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

12月30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派人于晚7点30分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从家中抓走。当天,校文革召开全校保崔大会。

本年 北京大学向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赠送教学仪器、标本、图书,价值人民币17万余元。

摘自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二版。

【读者来信】

1. 吴大印谈北大文革专辑

看了贵刊出的两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我的印象是，北大人整理清算本校的文革历史方面，远远地落后于清华。仅以大事记一项来说，北大只有一个校方出的、错谬百出的大事记，而清华的邱心伟、原蜀育却以一己之力，早在五年前就出版了《清华大学文革·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一书，沈如槐则在九年前就有《清华大学文革纪事》问世，其他还有孙维藩的《清华文革亲历》，以及《记忆》主编的《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的论文集。反观北大，除了聂元梓、郝斌、季羨林、金克木等几位老人写的回忆录之外，没有一部书能提得起来。当然，还有《梦系未名糊》、《告别未名湖》等回忆文章的汇编，但都是限于个人风闻，局限于一隅一人，全无宏观理念和整体眼光。

大事记是研究的基础，我曾经跟《记忆》的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北大人像邱心伟她们一样，搞一个民间的文革大事记呢？一者可以补校方大事记之失，二者可以为撰写北大文革史奠定基础。这种大事记，不必求全责备，有遗漏，有错误，是难免的，先在贵刊上刊发出来，请大家纠正补充。遗憾的是，贵刊至今没有动静。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我一直认为，北大人普遍缺乏清华人的历史责任感和自我反省的精神。或许，这一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给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带来的创伤有多重。

岳麓书院 吴大印

2. 杨新敏谈戴煌十万言书

这期最吸引我的仍是戴煌的文字，它比任何小说都更让人体会到人物在极端情境下最为细微的心理变化。为了能够摘掉帽子，他人成了地狱，在比奴隶还不如的高强度劳动、非人生活和卑贱地位下，却彼此昧着良心相互揭发，而对残害他们的人却从来都不敢怀疑，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情景呀！更要命的是，现在还有一些人顽固不化。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心理被扭曲，让人不得不担心噩梦再次降临到我们这个民族头上！

苏州大学 杨新敏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